

# 中國語文

14

THE CHUNG-YING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UB  
JUL 28 1953

5061/5600.1

一九五三年

八月號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中國語文一九五三年八月號目錄

### 討論和研究

- 科學名詞中的造字問題……………曾昭掄 (3)  
化學名詞門外談……………伯韓 (5)  
從科學新名詞的翻譯看漢字的缺點……………劉澤先 (9)  
外國語入地名譯音統一問題……………陸志韋 (14)  
關於外國人名地名用注音字母譯音的幾個問題……………彭楚南 (17)  
外來學術名詞應在什麼原則上統一起來? ……鍾兆璠 (19)  
統一譯名的迫切需要……………王仲聞 (20)

### 拼音文字和漢字的比較

- 拼音文字在出版技術上的優越性……………陳越 (22)

### 語文知識講話

- 語法講話(十四)……………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 (26)

### 語文教學

- 段落與場面……………吳奔星 (31)

### 報道·消息

- 本社舉行學術譯名座談會…………… (33)

### 信箱

- 對於字母問題的意見……………費虞、丁永福、金刀、谷敏 (34)

### 語文筆記

- “哈利遜”跟“海立勝”……………HIFI (13)  
我也談詞句解釋……………小舟 (32)  
借尸還魂的“桔”字……………寒 (33)



# 科學名詞中的造字問題

曾昭掄

隨着文化的發展，我們的詞彙不斷地豐富起來。舊的詞彙，一部分逐漸趨於消失；新的詞彙，則大量湧出。近百年來出現的新詞彙，爲數是非常驚人的。隨便拿一本最普通的俄文或英文自然科學方面的教科書，如果用一本十八世紀出版的字典去查那教科書中給的專門名詞，十有八九會查不到。同樣的道理，我國語文中的詞彙，一百年來，也在迅速地增長。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我們的新詞彙，一部分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另一部分，則是由外國文，以音譯或意譯的方法翻譯出來的。其中以自然科學名詞所佔比例最大，這類名詞迄今又主要係從歐洲文翻譯而來。因此從原則上看，譯名如何才算妥當，值得語言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共同注意。過去的名詞工作，具體編訂多，原則上的爭論少，是一大缺點。在科學名詞正在迅速走向統一的今天，我們在這方面多下點功夫，是常常有益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文中，僅就一個方面簡單談一談，就是翻譯與制定科學名詞時創造新的方塊字的問題。

## 造成新詞的種種方法

新的詞彙，是用以表示新的事物或觀念。歐洲文字中，新詞彙的形成，可採下列幾種方式：(1) 創造新的，一般多是多音節的(但也有一些單音節的)拼音字(例如 hydrogen, entropy, mol……等等)。(2) 借舊有字，但予以新的意義(例如化學名詞的 base, 土木工程名詞中的 concrete 等)或者更準確的，更科學的意義(例如物理名詞中的 force, energy, power 等)。(3) 用幾個字拼成的複合詞(例如 moment of force, atomic power,……等等)。一般地說，第一種方法是自然科學名詞中最常用的方法；第二種方法用得比第一種不多；第三種方法則往往係將第一法所創新字適當複合起來。但各種歐洲文字之間，習慣也不完全相同。① 因爲他們所創新字是拼音字，讀音不成問題，所以新字雖多，並不引起困難。而且因爲所造新字許是用希臘或拉丁字根，這些文字爲一般人所不陌生，所以不致由於望文生義而引起錯誤的瞭解。一個通曉英國人看見 chlorine 一字，只知道它是一種元

素，不會想到原來希臘字“綠”的意思。

拼音文字的一些便利條件，是我們方塊字所沒有的，這樣就給中文科學名詞的制定增加了額外的困難。漢文造成新詞彙的方法，計有下列幾種：

(1) 創造單個的新的方塊字，其中極大部分是形聲字(例如氫、氧、熾，……等)，或引用久已廢去的生僻舊字而予以新的意義(例如漚、甞、貳、醯等)，以成爲單音節詞。

(2) 用單個常見的方塊字而予以新的意義(例如物理名詞中的克、米等)或更科學的意義(例如物理名詞中的“力”、“能”等字)，以成爲單音節詞。

(3) 創造幾個(一般是兩個)新的方塊字，連寫在一起，成爲多音節詞，以作西文名詞的音譯(例如嗎啡、咖啡、呋喃、賽璐珞、珂羅酊等)。

(4) 將幾個常見的方塊字，湊在一起，成爲多音節詞，以作西文名詞的音譯(例如沙發、哥羅仿、阿司匹靈、伏特等)或意譯(例如水泥、原子、分子等)。

(5) 將幾個常見的方塊字湊在一起，成爲複合詞，以作西文名詞的意譯，或作爲中國自創的新名詞(例如電話、混凝土、同系物等)。

(6) 將新造字與常見字結合在一起，成爲複合詞，以作爲西文名詞的譯名或自創的新名詞(例如氯化鋅、活性碳、氯化、咖啡糖、氮雜苯等)。

以往各門科學所用名詞，其所採制定方法，重點各不相同。上列各法中，物理名詞，大都是用第二種及第五種方法造成；化學物質名詞，則主要是用第一種及第六種方法，以此化學家所造新字特別多。其次生物學家也造了一些魚旁、鳥旁的新字。

## 創造新方塊字的必要性問題

翻譯或制訂名詞，是不是需要創造新字？對於這點，專家意見不一致。有些人認爲根本不必造新字，其理由爲：(1) 有些科學(例如物理)，始終不過造了極少數幾個新字，已能完全解決問題；而那少數幾個

① B. A. 謝列布連尼柯夫，M. M. 古赫曼：《論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科學通報》，1953年7月號，81—2 面。



新字，實際上也並不是非造不可。(2) 人名地名的翻譯，現在一般都用普通常見的方塊字來譯音，並沒有困難；四十年前，雖曾有人將音譯地名的字加上土旁（例如歐洲的“歐”字加上土旁作“歐”），但此項習慣不久即完全歸於淘汰。(3) 我們能造新的方塊字，但不能在漢語中添上新的字音，因此造新字的結果，徒然是不必要地增加一些同音字。(4) 真正不能很好地用方塊字譯出的西文名詞，不如索性用注音字母，拉丁化等拼音方法寫出，不必勉強去創新字以增加學習上的負擔。(5) 原有漢字太多，現已感覺要精簡，造新字乃是與此種改革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特別在學術名詞中，造新字實難完全避免。他們的理由是：(1) 由於新事物的出現，千百年來，在一定限度內，造字多少成爲一種自然傾向；而且所造之字，通行以後，用來並沒有什麼不方便。古人所造之字，有如葡萄、枇杷；近百年來所造俗字，有瑛瑛、咖啡、泵等。至於自然科學家所造新字，則爲數更多；如硫酸鈣、鋁、呋喃、丙酮等等名詞，廣泛通行，並無不便之處。(2) 由於方塊字爲一種象形文字，見文生義的可能性特別大（這點與拼音文字大有區別），造一些新字以作科學名詞，可以避免與行文相混，可以避免誤解，因此對於學習有一定的方便，不能單純認作負擔。(3) 名詞不宜過長，特別是方塊字來寫，否則太耽誤時間。化學物質名詞，如不創些新字，而只是在現行方塊字中兜圈子，結果所成系統名稱必將搞到冗長不合於用。(4) 詞彙總不免有新陳代謝，一面舊字趨於消滅或精簡，一面必要的新字創造出來，這並不一定就是互不相容。新造的字並不太多，可是解決問題不小。

以上兩說，究竟是那種說法比較正確，還須經過爭論，才能得到結論。有的人認為單個的新字（如氫、氧等）決不宜造，一對新字造成的雙音詞（如嗎啡）則不妨用。這種說法，多少還是承認造字有一定的好處。現在許多自然科學家對於這問題的看法，似乎是認為只要名詞限於用方塊字來表示，造字終難完全避免，同時也沒有絕對必要予以避免；但是如果名詞可以部分地或者甚至全部用拼音文字來表示，則創造新的方塊字當然就沒有必要。這種說法並不是說，以前所造科學新字都是必要的或者都是造得很恰當。相反地，其中若干新字是造得不好，或者是沒有必要。

各類科學名詞中，過去搞得比較好的是物理名詞。例如作爲長度單位的 meter，如果按照以往化學家訂名詞的邏輯，免不了會造一個有偏旁的字（如“咪”）以作簡化音譯；但物理學家却不出此，大胆地

用了一個常見的“米”字，結果行得很好，絲毫不引起誤會，這是高明的地方。解放以前，物理名詞中，曾造了一個方塊字，就是相當於西文 entropy 的“熵”字。但是仔細看來，連這個字也是不必造的。Entropy 字，譯意不妨譯作“熱熵”，譯音則可譯作“恩特洛披”。有人說，這樣做，則 isentropic（等熵線）一詞不好譯。但事實上該詞譯作“等熱熵線”或“等恩脫線”，並沒有什麼不妥。至於化學物質名詞中，創了將近兩個新字，爲數過多，且其中有些音譯易於混淆，早就有人批評過了。

### 今後不宜輕於造字

制訂與翻譯科學名詞時，雖然不能說造新字完全沒有必要，也不必堅持絕對不再造字，但鑒於過去科學家造字太多太隨便，是名詞工作中（特別是化學名詞中）主要的偏向，而且過去所造的字似乎業已通用，今後應着重反對濫造新字。化學家造字太多，引起各方面許多批評。但不幸這種教訓，其他方面的科學家一般並不知道，反而有些人願意走化學家的舊路。解放以來，別門科學的名詞工作中，造字傾向反而有發展的趨勢，這是值得警惕的。例如物理學家解放前雖然不過造了一個“熵”字，解放以後却又造了“錄”與“燐”兩個字，而這兩字確實是不必造的。此外如部分工程名詞，生物學名詞，特別是生物化學名詞，隨便造字的風氣很盛，如不及時糾正，引起的麻煩與困難可能會很大，必須及時提起注意。如果科學家能相約兩年不造新字，對於科學名詞的合理化與通俗化，可以發生很好的影響。

### 現有科學新字的整理問題

現有科學新字，許多都已通行，不論有的專家有何反對，事實上無法可以廢掉。特別是一舉而把它去掉，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爲着改進科學名詞，減少新字的負擔，惟一可行的辦法似乎是逐字推敲，將其最易引起混淆或確無必要的，一一精簡或改掉。這種工作，在化學界已經開始做了一點<sup>②</sup>，不妨予以推廣。同時精簡漢字與提倡拼音化，並不是互相矛盾或各不相涉，而是可以配合進行<sup>③</sup>。所以即令我們主要目的在於走向拼音化，費些功夫去研究科學新字的精簡問題，也是有益的。

② 曾昭倫：《化學物質命名擴大座談會的總結報告》，《科學通報》，1953年6月號，44—45面。

③ 曹伯韓：《精簡漢字問題》，《中國語文》，1953年1月號，13—48面。



# 化學名詞門外談

伯 韓

在學術名詞的制定上，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怎樣處理外國語詞的問題。大體說來，我們處理外國語詞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翻譯成本民族語詞，另一個是吸收為本民族語詞。所謂翻譯是按原文的意思翻成我們原來的語詞或用我們固有的詞根構成新詞來表示它，這就是一般人所謂意譯。所謂吸收就是把外國語詞移植過來，使它作為我們語言的新成分——外來語，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音譯。這兩種辦法是不可偏廢的。大體說來，事物名稱如果不是我們所固有又沒有恰當的意譯辦法的，以音譯為好；其餘的語詞以意譯為好。事物名稱中，人名地名，我們一向是音譯；但學術上的事物名稱是不是音譯，大家意見就不一致。這可以拿化學物質名詞做例子。

比方有少數學者在制定化學名詞的時候，認為吸收外來語就是改變我們的語言，因為照他們的看法，漢語是單音節語，一個音節表示一個意義，而歐洲語言是多音節語，由幾個音節表示一個意義，如果吸收外來語，就是改變多音節語為單音節語，這是違反了漢語的內在規律，而且為羣衆所不能接受的。可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就不同。

本來作為現代科學之一的化學，主要是從外國輸入的，許多化學物質，我們沒有原來的名稱，如果採用外來語，並不見得就改變了我們語言的特質，相反的，這只有使我們的語言更豐富。我們古代就吸收過許多外來語，如葡萄、琵琶等，用久了就只覺得是自己語言的一部分，不覺得是外來語了。俄語中間也有不少的外來語，<sup>①</sup>認為“這不僅沒有使俄羅斯語言削弱，相反地，使它豐富和加強起來了①。”至於漢語是單音節語的說法，是受了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對漢語不正確看法的影響。其實漢語不是單音節語<sup>②</sup>，它不但一般語詞有許多是多音節的，就連根詞或詞根也有很多是的，例如“逍遙津”的“逍遙”，“蘿蔔英子”的“蘿蔔”和“英子”。漢語過去吸收多音節的外來語就很多。佛書裏複音外來語很多，只是因為和日常生活沒有密切關係，所以流傳不普遍；但如一般人熟知的“菩薩”“菩提”“阿彌陀”“涅槃”“般若”等，就都是複音詞。近代輸入的複音外來語，流傳普遍的很多，如

“摩登”“邏輯”“鴉片”“阿司匹靈”“維他命”之類，大家用得很慣，證明複音的外來語是羣衆所能接受的。有人說，外來語對於我們民族是一串不成意義的音節，和我們的語言毫無聯系，所以羣衆不能接受。其實任何語詞，當我們沒有了解它的時候，都是不成意義的音節，比方對三歲小孩講“辯證法唯物論”，所得到的反應就是這樣的。可是當我們了解了一個語詞所代表的事物是什麼以後，這一串沒有意義的音節對於我們就有意義了。我完全同意有些語言學家說的，外來語流行的過程是逐漸的，沒有系統地輸入的大量外來語，可能是經過較長的時期才流行的。可是吸收並不等於流行，在書面上一次吸收較多的外來語，和慢慢流行並不衝突。而且學術名詞的傳播，和一般用語不同，這點我們也得認清。學術名詞是經過有系統有步驟的教育過程來傳播的，它是和科學系統相結合的一套有系統的名詞，不是散漫零亂的一堆名詞。一門科學學會了，名詞就跟着記住了。

有些人對於音譯的主張常常發生誤解。一種誤解是認為主張音譯的就反對意譯，主張什麼都音譯。其實不然。凡是能够意譯的語詞，我們都贊成意譯。可是像化學物質名稱，很多是我們語言裏原來沒有的，為什麼不能借用外國名稱（有許多是國際名稱，不一定是哪一國的）呢？另一種誤解是以為主張音譯的就反對系統化，不論外國名稱有沒有系統，一古腦兒全搬過來。其實系統化是我們所贊同的（不過對系統化的寫法主張不一致）。化學名詞系統化是國際化學界的共同要求，中文化學名詞系統化的運動還是在國際化學界影響之下產生的，不見得外國名稱就沒有系統；不過一件東西初發現的時候，恰當的名稱不容易馬上定出來，只好暫時安下一個名稱，以後再來系統化，這種情形是存在的。所以系統化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我們採用學術名詞，當然採用系統化的，淘汰缺乏系統的，儘可能換用有系統的來代替無系統的；可

① <sup>ΔΣΥ</sup> 認為“這不僅沒有使俄羅斯語言削弱，相反地，使它豐富和加強起來了①。”

② 參看《中國語文》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號《論漢語》和一九五三年六月號《精簡漢字問題》。

是如果有些最新發現而大家定不出系統名稱的，當然也只能採用臨時制定的名詞。同時對於俗名的看法也得談一談。有人認為羣衆中間流行的名詞不合理，也要把它系統化一下（這才是改變語言！例如把已經流行的“維他命”改為“維生素”。又如把流行的“水銀”改為古老的“汞”，寫起來加上金旁，把砒改為砷，也都是改變語言）。我們認為俗名已經流行的，沒有改變它的必要。俗名是要便於稱呼的，所以要求簡短，系統化的名稱却不能專求簡短，主要是要能表現物質內部構造的特點。有些沒有俗名的，如果系統化名稱不長，就不必要有俗名；如果系統化名稱太長了，當然可以把系統化名稱簡化，造出俗名來。

制定化學名詞的諸位專家所用的系統化的方法，除採用金旁石旁草字頭等來分類以及製造同音詞等等是脫離語言實際的方法以外，其餘大體上是對的，比方首先確定表示各種基本成分的基本詞和詞根（他們把兩者通稱為基本詞），表示各種類別的詞頭詞尾和表示各種關係的“詞腰”（他們稱為介字），然後按照一定的系統把這些材料綴合成無數化合物的名稱。這個方法本來是國際通用的方法，在各國應用的時候，當然可以根據各種語言的構詞法來寫，但這並不是和音譯原則衝突的。有人以為主張音譯就是把鹽酸改成“哈已竺若克羅里克阿西得”這一類的辦法，這完全是誤解。鹽酸是用熟了的名詞，自然用不着再來音譯過。即使假定它不是用熟了的，可以音譯，那也用不着這麼個譯法。上面這個例子是根據英文翻譯的，英文原文 hydrochloric acid 是兩個字（詞）。照中文翻譯外國人名的例子，兩個詞之間得用小圓點分清界限（例如“卡爾·馬克思”）；原文第一個詞只有四個音節，第二個只有兩個音節，共計六個音節，可是用漢字寫出來，變成了十一個音節，所以拗口難讀，因此用漢字來音譯是不能譯得好的，只有改用字母來音譯才行。改用字母音譯以後，我們碰到輔音後面不拼元音的就讀得輕短一些，或者乾脆省略它不讀，這就不會拗口了。複音詞的音節分輕重音，就是長的名詞也不難念；單音詞分不出輕重音，連綴成複合詞就不好念了。例如“苯硫羰基氯”（ $\text{C}_6\text{H}_5\text{SCl}$ ）並不比 phenylthio carbonyl chloride 好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有十個音節，也比上面那個七個音節的名詞好念，因為這是由五個複音詞構成的。再說鹽酸這個詞兒，原文 hydro- 是從 hydrogen（輕氣）來的，ehlor- 是從 chlorine（綠氣）來的。我們要音譯，也得注意這兩個詞根和它們來源之間的聯系。假使輕氣和綠氣的名稱還是輕氣、綠氣，這兩個詞根就只能叫

“輕”和“綠”，不能改成“哈已竺若”和“克羅里”；如果那兩個元素也音譯了，就沒問題。我認為這就是系統化。再說，我們採用外來語，是採用它的詞根，至於詞尾形式，是可以考慮去掉或改為民族化的。例如素拉丁名有很多帶 -um 的尾巴，到了俄文裏面，不是把 -um 去掉，就是把它改成 -ni 了。有人說，去掉或者改變了西文構詞的方法（構詞的方法指詞尾的變化等等，如 chloride, sulphuric acid 中有 -ide 及 -ic；又如 chloro-benzene 中的 chlorine 將 -ine 改成 o），就失去了音譯的意義。這是大大地歪曲了音譯（即吸收外來語）的本旨。А. Я. Калман 談到俄語吸收外來語的時候，就指出俄語仍然保存了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害<sup>①</sup>。日文的化學名詞也可以作一個證明。例如《化學獨逸語新辭典》中，德文的 Magnesiumammoniumphosphat（就是  $\text{NH}_4\text{MgPO}_4$ ），在日文裏是“磷酸 ムグネシウム・アンモニウム”，把 phosphat 意譯並移到前頭去了，這正是按照自己的構詞法來寫的，同時也實行了儘可能意譯的原則。這裏面音譯的部分，用圓點分成兩截，各代表一種元素，意義非常明顯。我認為這就是系統化。有人說，音譯的名詞要有足夠的西文基礎才能理會，因而難學難記。並且舉出例子來說，譬如 ethane, ethyl 是顯然有關係的名詞，但是譯起來就成了“愛樂”和“愛醉兒”，差之甚遠了；ethoxy 很顯然是 ethyl + oxy，中文譯起來就成了“愛嫂克西”，看不出是“愛樂兒”加“俄克西”了。這種看法完全是主觀片面的。因為這些事實只能證明方塊字寫外來語的毛病，不能證明音譯名詞的毛病；假使改用字母來寫的話，這種看不出關係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採用字母來寫外來語，就不必呆板地音譯（人地名可以比較注重音），可以注意採取國際通用的字形，如英文字母 i 長短音大不相同，我們不必跟着它們的不同的音來拼，只是用一個和 i 相當的字母來表示它；同樣，像 ethoxy，我們也不必把 th 和 o 拼出個“嫂”的音來，我們還是可以把 eth 和 oxy 當做兩個詞根來看，猶如日文把 acetylacetone 寫做アセテル・アセトン在當中加圓點隔開一樣。用字母對字母的翻譯法，有些人稱為“形譯”，形譯是用字母來音譯學術名詞所必須採取的一種方法，用這種方法來寫外來語，就容易標準化，使大家寫起來一致，不至於受個別外國語的影響而迷失了國際化的方向；尤其是能顯示複雜名詞的內部構造，使沒有西文基礎的人也能理會。

照這樣看起來，用字母來寫外來語，也得定出一

① 同①。



第二點，漢語有吸收外來語的可能性，這已經有

第三點，化學新字同音很多，如“鎘、酶、鎢”“銻、銀、茛”“鉕、鎘”“硫、銻、砒、鎢”“氮、鉍”“鎢、碲、銻”“砒、硒、錫、銻、烯、醯”等，共計二十餘組，除一部分因為應用的範圍不同不致相混外，大部分在說和聽的時候容易引起混亂。雖然勉強規定了四聲的分別，也無濟於事(因此有人提出要用“金旁申”“石旁申”“肉旁申”的說法來分別“鍾、紳、肺”三個字)。像 T I 音有六個字，就是四聲分別也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氯化乙烯”和“氯化乙醯”，聽起來毫無分別。這種毛病的發生是由於拘泥文言文的用字方法，

拿一個音節作爲基本的意義單位（他們強調“一音一義”，又說一個ㄉ音有人、仁、壬、任、妊、紕、薦、七個意義）<sup>①</sup>又因爲漢字表音不靈活，不能在簡單的音節上作較細致的分別。如果除採用一部分單音節詞之外，還採用一些多音節詞，而且酌量吸收外來語，用比較方塊字靈活的字母來寫，就可以避免這個毛病。例如“烯”英文是 alkene，作詞尾時只用 -ene；“醯”，英文是 acyl，作詞尾時只用 -yl；我們參考這個材料，可以把前者叫 Y ㄣ，作詞尾時用 ㄣ 或 ㄣ，把後者叫 Y Δ 1 ㄣ，作詞尾時用 Δ 1 ㄣ 或 1 ㄣ。——這不過是一個假定，表示用字母造詞的靈活性吧了，如果真的要字母來寫一套名詞，還得全盤考慮才能定出來的。

第四點，化學新字用不發音的象形字偏旁表示化學物質的類別，又用筆畫形式表示物質分子的內部構造，這些方法都和語言沒有聯系。例如以金旁表示金屬元素，字音裏面並不包含“金”的音；又如用“罍”表示 porphin，是利用字形表示這種物質分子的內部構造，這個字念“雷”，據《字彙補》說，就是古文“雷”字，“雷”和 porphin 這種物質是毫無關係的。

以上這些缺點，是象形方塊字共同的毛病，並不是化學新字所特有的。專家們造這些字，絞了許多腦汁，設計的確很精細，這是我們所欽佩的。問題不在於某個字造得好不好，而在於象形方塊字的體系是不是還可以作爲今後創造新字的根據。

我們漢字要拼音化的方針是已經確定了，在拼音文字推行以前，漢字本身也得加以簡化——減少通用字數，刪去一字數形的異體字（現在有些化學家却主張用鹼鹼兩個異體字來分別 alkali 和 base）並且簡化筆畫。在漢字簡化的過程中，漢字本身也應該逐漸音標化，它的象形特點不應該再加以發展，新的方塊字不宜添造，而字母拼音的新字就應當作爲漢字的輔助工具，逐漸用到漢字文章裏面去。這不是任何知識分子標新立異的主張，而是工農兵大眾學習文化過程中提出來的客觀要求。象形方塊字的確是太難學習了。許多學員在學過注音字母拼音進入突擊生字階段的時候，都發生一種感想：要是就寫拐棍字多好啊！這種心情，曾經度過十年窗下的生涯的知識分子由於已經掌握了複雜的象形字，是不能體會的。可是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要爲羣衆服務，那麼與其挖空心思來利用象形字的金旁、石旁、肉旁、火旁、氣字頭、草字頭等等來表示各種元素或有機化合物的類別，創造一些難認難寫的新字，就不如從“拐棍字”上想辦法。

中國文字改革的第一個步驟是打破文言文和方塊字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使脫離了活語言的書面語重新

和活語言結合起來。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已經做到了一部分，就是把文言文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基本上打破了。可是方塊字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雖然那時候人們也企圖打破它，還是沒有打得破。今天羣衆中間產生了許多新的簡體字、詞兒連寫的方塊字、拐棍字等，五花八門，已經在打破漢字的不可侵犯性了。有人認爲在拼音文字實行以前，必須百分之百的照原樣使用漢字，我覺得這是違反羣衆的要求。有人考慮到將來的拼音文字另有一套字母，就覺得注音字母沒有用處，却不想想將來由注音字母的拼音字改成新的拼音字是很容易的，而從草字頭、肉字旁的讀音混淆不清的方塊字改成拼音字要麻煩得多呢！到那時候，草字頭、肉字旁在拼音字上無法表現，羣衆反而會要求保存這一部分難寫難認的怪字了。比方《中國語文》的一個讀者來信質問袁翰青先生（因爲袁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從化學物質的命名看方塊字的缺點》）說：“如氯化乙炔和氯化乙醯，在聽的方面固然不好分別，寫出來一定看的懂。假使要拿字母寫出來，還不都是 XΓXYITI，這又有誰聽的懂呢？”從這個例子看，這一套化學新字客觀上會給漢字拼音化增加一些困難，是顯然的，雖然造字的專家主觀上並不想給漢字拼音化添麻煩。

在化學新字中間，我們也發現了它們的內部矛盾。它們大體可分爲三種類型：一種是最落後的純粹象形字，如罍、甬兩字，象化合物內部結構的形式，可以隸屬六書中的指事；一種是半象形字，就是形聲字，這種最多；一種是切音字，這種字不多，只有巖（ㄌㄣ）煙（ㄌㄣ）煙（ㄌㄣ）巖（ㄌㄣ）等幾個。這最後一種，有人譏笑它是六書以外的第七書，可是它是有一些進步性的，因爲兩個半邊都是音符。它的缺點就是採取了形聲字的外貌，和形聲字用在一起，不好分別，人家容易照形聲字的讀法念半邊。在同一外形之下，切音字和半象形字發生了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至少這幾個切音字應改用注音字母拼寫。此外，還有吡喃，吡咯等字，還沒有經製定名詞的化學家承認，可是這些字却是比較進步的，因爲它們是純粹的音符，口旁並沒有象形字的作用。

學術名詞是很複雜的，化學名詞尤其複雜，門外漢的建議，免不了隔靴搔癢的毛病。可是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來，請學者專家門加以考慮，似乎是有必要的，因爲一兩百個單音化學名詞數目雖然小，但是它們是構成百十萬名詞的基礎，而且可能成爲其他學術名詞的榜樣，影響是不小的。

① 陶坤：《化學物質的中文命名問題》，《科學通報》，三卷六期。



從科學新名詞的翻譯看漢字的缺點

劉 澤 先

看一看世界上各種主要文字的學術名詞，咱們似  
乎可以歸納一個規律出來：越新的名詞，在各種文字  
中就越趨向一致。

這裏所說的“一致”，並不等於“相同”。各國儘管  
使用各國的文字來寫，而且適應各該國的習慣或者要  
變更一下寫法，發音也可以“各自為政”，可是這都是  
很自然的、很必要的“調整”，“調整”的規律也很簡  
單。例如，拉丁文的詞尾 -ium 到俄文裏多半變成了  
ий；拉丁、英、德、法等文名詞裏的 ph 和 f 在俄文  
裏是 ф，在世界語、意大利等文字裏是 f，在日文裏是  
フ等。這些名詞的各國文字，咱們一看就會知道它們

是同出一源的。  
“越新的名詞，在各種文字中就越趨向一致”可以  
從化學元素名稱的統計數字中很清楚地看出來。我選  
用了四種有代表性的文字來作統計的根據，這四種文  
字是：俄文、英文、德文和日文。俄文的特殊性和重要  
性大家都知道，不用我來多就。英文和德文是世界學  
術上兩大陣營的文字，一向被大家認為是兩個不同派  
別的主力。日文代表了另外一類截然不同的文字。  
俄文、英文和德文名稱都根據《化學物質命名原  
則》<sup>①</sup>裏的《元素表》，同時也參考一些其他材料。日  
文名稱是根據日本化學會編《化學便覽》裏的《1951 年  
原子量表》。

統計的結果請看下表：

發現元素的世紀	17世紀和以前		18世紀		19世紀		20世紀	
俄、英、德、日四種 文字名稱一致不一致	不一致的	一致的	不一致的	一致的	不一致的	一致的	不一致的	一致的
元素符號	Ag As Au C Cu Fe Hg P Pb S Sb Sn Zn	Bi	Cl F H N O Pt W	Be Co Cr Mn Mo Ni Te Ti U	B Br I K Na Si	Ac Ne Al Os Ar Pd Ba Po Ca Pr Cd Ra Ce Rb Cs Rh Dy Ru Er Se Eu Se Ga Sm Gd Sr Ge Ta He Tb In Th Ir Tl Kr Tu La V Li Xe Mg Y Nb Yb Nd Zr	Lu	Am At Cm Fr Hf Ho Np Pa Pm Pu Re Rn To
總數	13	1	7	9	6	46	1	18
世紀別百分比		7.1%		56.3%		88.5%		92.9%

附註 (1)Bk、Cf、An、Ct 四元素的材料不全，所以沒作比較。表裏只比較了96種元素。  
(2)Rn的德文名字根據《化學物質命名原則》是 Niton，跟其他文字不一致。但是我找了幾本德文化學書看，例  
如 Standinger und Rienäcker:《Tabellen aus der allgemeinen und anorganischen Chemie》，1944；Helmut  
Stapf:《Grundlagen-Chemie für technische Berufe》，1950；等書，它們用的都是國際一致的Radon。根據這些  
德文材料，Rn 的德文名稱應作 Radon，是國際一致的。  
(3) Lu 的德文名字是 Cassiopeium 或 Kassiopeium，跟其它文字不一致。但是也有一些材料上可以看出，  
德文也用國際一致的 Lutecium，例如，見荒川惣兵衛：《外來語辭典》第1127頁。

①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學術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公佈：《化學物質命名原則》。

從上面的統計可以看出來：越是新名詞就越趨向國際一致。19世紀和20世紀出現的新名詞就絕大部分都是國際一致的了。

## 二

名詞國際化有許多好處：

(1) 翻譯起來簡單，不用多費腦筋，也不用查書。

(2) 立刻可以翻譯，不必等政府動員專家開會，爭論、印草案、試用、公佈，然後才能確定應當翻譯成什麼。

(3) 不同的人翻譯出來的名詞也能一致，都不失原意，不走原樣。

(4) 便利國際間文化交流。例如，不同語文的各國科學家可以坐在一起討論某項科學“命名”問題而不致於有什麼困難。

(5) 一個人，儘管他求學的時候要學外國語，却用不着完全另起爐灶地再學一套完全不同的科學命名系統。

以上這些好處咱們都得不到，因為咱們的科学名詞遠不够國際化。使用漢字是不可能把名詞弄得很國際化的。

然而這裏所說的“國際化”跟某些化學家的“國際化”意思並不太一致。我們說的“國際化”，是指各國名詞可以通過一定的簡單規律互相翻譯，例如英文的 Calcium 或德文的 Kalzium 可以跟俄文的 Кальций 或日文的カルシウム<sup>②</sup>按照一定的規律互相翻譯。中國某些化學家認為“鈣”也是“根據國際命名方法”“音譯”出來的，但是這樣的“國際化”一點規律也沒有，只能硬記而不能理解。並且誰也不明白為什麼 Calcium 不更正確地翻譯成“鐳”、“銻”或別的；反過來，誰也不明白“鈣”為什麼不相當於 Gallium 或 Gadolinium 等。

外國語文之間的翻譯——比方說，德文和日文之間的翻譯或俄文和英文之間的翻譯——都並不太容易。但是科學新名詞的部分翻譯却很容易。外國語文還沒學得很好的時候，科學新名詞就先會翻譯了。中國語和外國語之間的翻譯情形相反，科學名詞的翻譯最難，而且越新越難。即使您的外國語跟外國人一樣高明，不用查字典就可以翻譯一般的東西，可是科學新名詞您還是不會有好辦法的，——您必須買一門一門的《名詞草案》、《命名原則》、《名詞對照表》等，幾乎要一個挨一個地去查。三查兩查居然查到了的，那都是幸運的新名詞。另外許多不幸運的新名詞，您常

常會費了一天功夫遍查參考材料而一無所獲。

新名詞的不國際化給咱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首先，咱們必須組織許多專家和工作人員來從事“制定”工作。許多名詞的譯名大家意見分歧，常常“聚精會神，引經據典”，熱烈地爭論很久<sup>③</sup>，有的雖經數次修改也還是覺得不太滿意。工作是長期性質的，因為新名詞每天都有出現。過去的工作主要是根據英文材料翻譯，今後又要根據俄文材料再來。外國也許會有類似的工作，可是人家的工作是簡單不成比例的，英、德等文的 Plutonium，翻譯成俄文自然是 Плутоний，翻譯成日文就自然是 プルトニウム。大量像這類的“國際化”的名詞根本用不着誰來“制定”。可是咱們呢，先後翻譯成“鏷”、“鏷”、“鏷”、“鏷”和“鏷”<sup>④</sup>。究竟“鏷”有多長壽命，那還難說得很。從譯名的制定上看，咱們每年要比人家多浪費不少物力，人力和時間！

再說翻譯或教研人員等，還得預備許多門類的《草案》之類的書，逐字去查。有經驗的人都知道查名多麼苦惱，多麼費事。在這方面，咱們又有多大的浪費！

因為名詞不好辦，有的同志打消或拖延了某些書籍的編譯。這，我聽說的已經不止一次了<sup>⑤</sup>。這種情形似乎外國不大有。這也是名詞不國際化所引起的損失。

就國際化的名詞部分來說，外國學生只要學會一套就够了。而中國學生除了學會了中國的一套以外，在學外國語的時候，還得另學一套。同是學生，同樣都要選修外國語，中國學生比外國學生（例如比日本學生）學習的負擔要沉重得多。

## 三

有些同志說：“你說的這些都是翻譯上的問題。我

② 日文名詞過去也很分歧，那是因為系統和方法不一致，而不是沒有方法或規律。只要決定了簡單的原則，日文名詞是容易統一的。

③ 黃宗甄：《關於自然科學名詞的編訂工作》，見《翻譯通報》第2卷第3期。

④ 袁翰青：《從化學物質的命名看方塊字的缺點》，《中國語文》1953年4月號。

⑤ 報刊上也常見到類似的反映，例如湯心豫同志說：“……H. D. Burghardt 的《Machine Tool Operation》……這部書十幾年前就有原文的影印本，在國內一向極為流行。但現在還沒有譯本出版。專門名詞的譯名問題是翻譯這書的主要困難，而且是使讀者確切無疑地看懂本書的決定因素”。見《翻譯通報》第1卷3期。



要以事物爲對象制定合理的名稱給廣大羣衆使用，能爲了‘翻譯’來遷就外國語”。

這話很有問題。

咱們不能不承認，咱們中國過去的科學很不發達，龐大數量的科學名詞是從外國輸入的。這些名詞是通過翻譯而輸入的。咱們現在的“名詞工作”基本上是“決定譯名”。所以，統一名詞的問題在目前基本上就是翻譯名詞的問題，翻譯方法不研究好，名詞作就不可能作得好。這是一。

翻譯工作不是少數專門搞翻譯工作的人的事情。可能依靠少數人就可以把外國的學術大量地輸入。翻譯工作本身就是羣衆性的工作，翻譯的困難就是羣衆的困難。這是二。

中國人也跟外國人一樣，一到中學就要學外國語。大的工作人員和羣衆，現在也展開了學習俄語的運動。學外國語主要的目的是要通過閱讀來學習先進的理論和經驗。這部分羣衆雖然不一定從事翻譯工作，但是名詞翻譯起來容易不容易直接影響着每一個人外國語的學習和運用。也可以說，名詞規定得古怪生硬，使人難以運用，吸收國外文化也就困難。這是三。所以，把名詞的“制定”跟“翻譯”看成兩件關係不的事情是不對的。不考慮翻譯方便不方便的“制定”是不妥當的。

許多同志認爲“一切名詞都要以事物爲對象根據國語的語言來命名”。

這句話裏也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這些同志們的一個理由是認爲外國命名當中有許多不合理的和凌亂的，原樣不動地吸收過來非常不妥當。這句話是相當正確的。國際命名當中的確存在着合理的和凌亂的部分。但是，這話又得分兩方面來談。第一，大體上看起來，國際命名系統是非常細緻、精確、清楚的，是可用的。修正某些不合理的和凌亂的部分，適當地、批判地、而不是任意地吸收若干而不是所有的)國際名詞，是可以的。第二，許多名詞上的毛病似乎沒有吹毛求疵的必要。國際上的 Vitamin 在中國語言裏譯成“維他命”或 ВІТАМІН，並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少數化學家指出 Vitamin 並不含有 amin，於是就改譯成了“維生素”。“維生素”是意譯詞，從字面上可以推測它的意思，可是真要這麼辦準了，開玩笑話：可能有人以爲人不能缺的“鈣質”、“鐵質”、“磷質”什麼的都是“維生素”；也可能有人以爲“維生素”跟“抗生素”是相反的東西；還可能有更笑話的誤解。另外有許多國際名詞，被認爲是從不合理的希臘來的，必須改譯成金旁、石旁或草字頭的名字才

合理。可是同樣根究一下的話，金旁、石旁或草字頭就合理嗎？恐怕更不科學化吧！

名詞最好是從構成部分和來源分析起都是正確的。但是這常常是不可能的。同時，除了少數專家以外，咱們也沒有必要去分析每個名詞的構成部分和它的來源。人們早就知道思想跟大腦的關係了，可是“心理作用”也用不着改成“大腦理作用”；“心不在焉”也用不着說成“大腦不在焉”。德文的 Sauerstoff 或日文的“酸素”比中文的“氧氣”或“養氣”更不合理一些，類似的情形很多，可是這一點點不合理基本上沒有成爲人家化學發展的累贅，人家的化學命名系統照樣系統清楚，便於學用。中國的化學家們希望中國的化學名詞比世界各國的更合理一些，這理想自然崇高無比，不可非議，但是由於事先沒有在語文學方面多加注意，結果咱們化學名詞反而有許多嚴重的缺點了，化學名詞的缺點真正地成了化學發展的絆腳石了。爲了無關緊要的詞源問題反而造成了許多實用上的麻煩，這是得不償失的。

這些同志的另外一個理由是認爲吸收外來語是違反中國語言（注意：是“語言”）規律的；外來語是跟中國語言格格不入的名詞。

外來語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生疏的，尤其是音節長的名詞。這是事實。但是咱們却不能說，外來語是違反中國語言規律的，外來語是跟中國語言格格不入的。中國語言和許多種語言一樣，是能够接受外來語的，而且一直就在不斷地用外來語來豐富着自己的。中國人決不笨到不能吸收外來語的程度。瞿秋白同志早就指出過這種可能性：

“雖然一些新的字眼和句法，本來是中國話裏所沒有的，羣衆最初是聽不懂的，可是，這些字眼和句子既然在口頭上說得出來，那就有可能使羣衆的言語漸漸的容納它們⑥。”

這些同志們也許沒有注意到，這些所謂違反中國“語言”規律的、格格不入的外來語，早就“入”了中國的語言了。沈志遠同志指出過：

“……用習慣了，音譯和意譯是可以一樣爲大衆所熟悉的。例如“水汀”（“水”讀作“斯”）在上海一帶遠比“暖氣管”爲熟悉；在廣州、香港一帶，“的士”、“巴士”等名稱，遠比“出租汽車”、“公共汽車”爲熟悉。機器工廠裏的工人，說起話來滿口摻雜着機械上的音譯名詞，可是一到知識分子著的書本上都變成了“文雅”的譯名，反而令人有晦澀難懂之感，這

⑥ 瞿秋白《再論翻譯答魯迅》，見《亂彈及其它》437頁。





子不便舉得太多，以免印刷局和校對同志生這些例子看，並且仔細分析失敗的原因，歷史正證明的，倒是造字的行不通。

#### 四

上所討論的，可以歸納成下面幾點：

- 1) 各國的科學名詞，越新就越趨向國際一致。
- 2) 科學名詞國際化有許多好處，中國的譯名脫系統是很吃虧的。
- 3) 中國科學新名詞決不是不可能國際化的，某不贊成中國科學新名詞國際化的理由是不充分。

末，中國科學新名詞國際化過去究竟為什麼搞呢？

正的理由很簡單：是拙笨的漢字妨礙了名詞的

字書寫困難，不便於記錄多音節的外來語，這原因之一。所以，即使是已經容納在羣衆的語的外來語，因為用漢字寫出來的時候會使人覺囉索，書本上也常不用它。

字同音字很多，同一個音，你用這個字寫，他

用那個字寫，大家不一致。D.D.T.的譯名有“滴滴涕”、“敵敵體”、“提提替”、“第第涕”等，混亂得很。

用漢字來記音，由於各省讀音不一致，反而造成了語言上的分歧。廣東人把 cents 譯成“仙士”；上海人把 cement 譯成“水門汀”，北方人念起來就不像樣了。北方工人把連接水管子的另件叫作“由任”，原來那是 union 的上海音譯名詞，用北方音念出來跟原音不知道要差多少！

漢字的讀音都帶母音，而且都帶四聲，標音的正確性很難讓人滿意。字和音的聯系也缺乏一定的、簡單的規律。

總之，漢字是很不適合用來吸收外來語的。

使用拼音字母就可以基本上解決以上的問題。用拼音字母可以很容易地吸收大量外來語來豐富祖國的語文；用拼音字母寫外來語可以使中國的學術名詞有可能逐漸統一；使名詞工作簡單、快捷；可以節省專家們的時間精力；可以減輕廣大人民學習和使用的負擔。這樣，中國的學術名詞系統才能和外國的一樣優秀甚至比外國的更優秀；中外之間新名詞的翻譯才能達到美滿的境地。

1953, 7, 18。

## “哈利遜”跟“海立勝”

4151

1953年七月二十八日，《朝鮮停戰協定》在《人民日報》上公佈了。一位認真讀報的朋友拿着報紙來問“代表聯合國軍簽字的威廉·凱·海立勝，是個什麼人？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乍一看，也楞住了。“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代表，美國陸軍中將”，報紙上一向不都登的是“哈利遜”怎麼今天正式簽字時候，倒忽然變成了“海立勝”呢？ГҮҮҮІΔXҮ, ГҮҮҮІPҮ, 聲音也不大對頭呀！

找出《協定》前面的消息一看，却仍然寫的是“由我方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大將與對方代表團首席代表羅中將正式簽字”。這才敢於斷定：原來海立勝者，即哈利遜也。

“哈利遜”為什麼要變成“海立勝”呢？大概是美軍司令部的一些粗通中文的譯員覺得從漢字字面上看，不如“勝”，“利”不如“立”吧？至於“哈”為什麼要改成“海”，却不懂了。或者是 Harrison 的 Ha 本該作 [hæ] 吧？可是，硬認為“遜”字不吉利，不適於做一位將軍的名字，却仍然是並未深通中國文字和原故。三國時代東吳的一位將軍不是叫“陸遜”嗎？他可並不因此像美國將軍一樣老打敗仗。

問題倒在於用漢字譯音，在外交上發生麻煩已經不止一次了。“和蘭”曾被要求改為“荷蘭”，“阿特里”曾被要求改為“艾德禮”。幾乎每個外國駐華大使的官名用字都要經過一番研究協商。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一統一的、不發生字面含義問題的譯音辦法，這種麻煩仍然會發生下去的。可是如果我們仍舊沿用漢字譯也就很難拒絕人家挑選自以為美滿吉利的字面。這樣一來，任何標準譯音漢字表，都會變成廢紙，統統還是作不到。

如果我們不用表意重於標音因而易於引起字面好看問題的漢字來譯音，而用一套根本不發生含義問題拼音字母來譯音（比如說用注音字母），那麼我們就可以有一套統一的音譯制度，每個人名、國名只可一種譯法，沒有任何挑選的餘地和理由。就讓有人來挑選，我們也可以按照譯文應當按照一國文字既有的理由加以拒絕。而這一點，繼續用漢字譯音可就不容易作到。

# 外國語人地名譯音統一問題

陸志韋

提出這個問題來，是因為人地名的譯音現在相當混亂，同一個名詞有兩個以上的譯法，有時候叫人認不出來是在翻譯同一個名詞。要把譯名統一起來，目前有三條路好走。(一)是仍然用漢字，這我們已經做了二千多年了。(二)是用注音符號。(三)是照抄拉丁或是斯拉夫字母，不管人家認識不，希望經過短時期的學習，會叫外國人地名，通過字母，自己會“報到”。還沒有遇見過想走別的路子的人。可是很有人在觀望，想等新字母方案頒佈了之後再來整頓譯音，暫時任憑漢字混亂下去。這樣一味觀望雖然是不必的，但是在這過渡時期討論統一譯字的手續，無論是主張用漢字的，或是某種聲音符號的，所整理出來的原則、條例，倒是應當能轉移到將來的拼音方案上去。

三條路之中，不妨先談注音符號，最近很有人想試一試。能掌握注音符號的中國人，現在已經比認識拉丁字母的人多的多了，比能全部認識通常用來對譯外國人地名的漢字的人也多得多了。但是注音符號首先會碰到兩重難關。一則認識的人儘管多，注音符號本身將來未必能成為正式文字。新的拼音方案雖然沒有擬定，可是據我們所能推測的，它決不會保持注音符號的形式，至多是零零碎碎的採用幾個符號。二則知識分子已經用慣，看慣了漢字的譯名，就不願意改用注音符號。有的人連這套符號都沒有學過，有的人學了也沒有用慣。任何新的譯音手續，假若不能為新舊知識分子所接受，就不容易行得通。

那末，我們就不討論用注音符號譯音了麼？這可不必。知識分子是會感化的，只要他承認有用注音符號的需要。並且將來注音符號儘管廢止不用了，我們在它的基礎上規定出來的一套譯音條例滿可以搬運到新字母上去。下文要談的是：注音符號本身能不能擔負翻譯人地名的任務。

注音符號至少有一個長處。用他來翻譯人地名，立時會免去方言不統一的困難。在半殖民地時代中國人喝過“屈臣氏”汽水，大概是廣東人先喝了的，上海人也許會喝“滑城氏”，北京人喝“娃簪氏”。真正的名稱是 Watson，翻成注音符號是 XYFㄣ。也不必肯定全國人

都會念出 XYFㄣ 的地道北京音來，反正大致不會念得比漢字更是怪腔怪調的。

當然，注音符號跟漢字有同樣的限制，就不夠用，(輔音，元音；聲母，韻母)。注音符號北京音系。北京話就只有那麼些聲母，韻母。不能算是基本困難。那怕所翻譯的某種語言，聲母，韻母並不比北京話多，甚至於還要少，對譯的時候還是有困難的。因為兩方面的音節決不能一地恰巧對上。這是兩種語言聲韻結構上的參差。在乎文字用什麼符號，也只是一小部分關乎某種實際用到多少個不同的音節。(可以參考俄文，英對譯漢字，Колоколов 法，Wade 法。這兩種音節儘管多，英語比北京話也許多二十倍，還是北京話的音全部譯出來。比如：俄語不分ㄣ跟ㄣ沒有 ㄣㄣㄣ 等等)。

惟一可能的對譯法是這樣：(一)先盤算一話的聲韻系統有多少本錢，能做多少買賣。照注音符號的寫法，會積壓多少本錢，比如把四個二合元音ㄟ、ㄟ、ㄟ、ㄟ製死了，買賣就做不開了。(二)然後盤算對譯的語言的聲韻系統，知道買賣有多大。(三)看注音符號有哪些個單音符號，哪些種結合音符號能很快地對譯外國語的哪些個單音，哪些種結合音。就英文來說，c 相當於ㄘ，sh 相當於ㄕㄣ等等。(四)北京話的音和注音符號拼成的音節，有哪些個是某種外國語用不上的，例如ㄣ，ㄣ，ㄣ，ㄣ不能對譯俄語，因為俄語本身沒有ㄣ收聲。(五)最後考慮怎樣應付那些不能直接對譯的聲音。應付的人儘管不同，但是必須遵守一個起碼條件，就買賣的本錢只有北京音，並且在所討論的範圍之內只有北京音讀的注音符號。可以舉一件時常遇到的事情來說一說。目前需要音譯的人地名絕大多數是英德法四種語言。這四種語言都有 b, d, g 等音，p, t, k 等等清音。他們的 p, t, k 有時是 p', t', k'，正像漢語似的，可是 p 跟 p'，從不代表什麼意義，那就是說，像俄語裏不會有一個 [p'insk] 來一個 [p'insk]，代表兩個不同的地方。這樣對譯音，一清一濁，假若用某些南方方言對譯它，是容易的，並且本錢太富裕了，因為這些方言裏有 p



p, b, d, g。北京話可不然。我們得用 p 跟國語的 p, p' 跟 b。這問題上, 近幾年來已經種不約而同的應付手段, p 對 b, p' 對 p, p'。

者參考了好些對音方案, 全都在這件事上表別的問題上, 意見當然是可以有出入的。

以爲編造漢語和外國語的對音方案, 用注音來會比漢字便利得多。除了上文已經舉出來還可以說些別的: (一)北京話的音節不單是

, 又老是有音無字。有的音節是能說的, 可字寫下來。例如 17 的前面不聯 7, 讀字也只有一個“您”字, (不像人的名字, 因此譯成“列寧”)。改用了注音符號, 717,

可以隨便寫。(二)人假若真的掌握了注音該能說北京話的捲舌音。那末, 像俄文的 17,

以用 7P(口) 對譯。同是那些人, 假若用漢

唸出類似的聲音來, 除非漢字的讀音能在北

礎上統一起來。(三)此外, 作者又想起前些

翻譯通報上有幾位先生談到西文書裏引用中

跟東南亞的地名最不容易翻譯, 因爲中國歷

有過用慣了的譯名或是漢名, 一時想不起來

出來。現在改用注音符號, 至少可以“藏拙”

翻譯, 免得古今兩套漢字互相衝突。

說的都是小事, 或多或少有點好處。用注音

處, 倒好像沒人留意過。Сталин 譯成 8ZY-

經有人試過了。這兩套符號唸起來十分相像,

人會把 8 唸得太長一點, 變成一個獨立的

不要緊。再試試 Магнитогорск ПУ《3182-

唸起來還像樣不像樣? 當然你可以說, 反正

漢字更不像樣, 漢語的聲韻系統天生就是那

黑。更重要的, 是請一位不懂俄文的, 不懂

文字的中國人唸唸這一大串注音符號試試。

不出音來。決不能說, 只要用上拼音符號, 譯

音符號更難用就好了。

## 二

其次談照抄拉丁字母或是斯拉夫字母。所謂“照抄”, 就是按着字母一個一個描寫, 夾用在漢文裏。看見 Joliet 就寫 Joliet, 不管原文的字母是否全都發音, 也不管 Joliet, Judge, Johannes, Cajal 的四個 j 唸成 [ʒ][dʒ][j][x] 四種聲音。這是最容易也是最不負責任的巧勁兒, 別人能唸不能咱不管。用斯拉夫字母倒好辦, 因爲字母的發音相當確定, 並且現在蘇聯人對譯英法德西等國的人地名都有一定的規矩, 刪去不發音的字母。中國人對英法文的讀音不大熟悉的, 倒不妨通過俄文的轉譯再對譯成漢字或是注音符號。但是要把斯拉夫字母照抄下來, 不用說轉譯西歐的人地名, 就連蘇聯本身的人地名, 怕還是行不通, 至少是時機沒有成熟。那末, 還是回去用拉丁字母吧? 像上面說的依樣畫葫蘆照抄, 可是絕對不行的。譯文的拼音, 必須跟原文相當接近, 不是字母相同, 乃是發音相近。要這樣做, 至少有兩種手續可以試試。一是把英、法文的人地名改寫成國際音標。老實說, 要把英語的音聲對譯得相當正確, 非通過這套手續不可。但是一般的讀者有多少能唸國際音標的呢? 勢必又把國際音標改譯成漢字或是注音符號。英文翻國際音標, 音標再翻漢字, 最近也有人試過了, 不止一次。現在不必討論這種手續, 因爲跟我們討論的出發點, 就是照抄拉丁字母, 相去太遠了。第二種手續是另造一種拉丁字母的標準音符來對譯英、法文的拉丁字母, 爲的是叫發音有一定的依據, 像美國的《韋伯斯特字典》的注音似的。這種奇形怪狀的東西, 就算是拉丁字母吧, 夾用在漢文裏, 並且不再加上漢字對譯, 能行得通嗎? 顯然是兒戲。顯然是還不及注音符號或是漢字。

總而言之, 譯音是必須相當近乎原音的。照抄斯拉夫字母是可以考慮的, 只要大多數讀者已經熟習斯拉夫字母。這幾年來, 德國人又改用拉丁字母了。照抄德語人地名的拉丁拼音, 雖然不比斯拉夫字母好唸, 也勉強可以試試, 只要大多數讀者已經熟習拉丁字母。英法文的拉丁拼音絕對不能照抄。按照實在的發音改寫, 也不如乾脆就用注音符號或是漢字。

## 三

最後才談用漢字對譯外國語人地名的統一。這是統一漢字譯法的問題, 不是統一音標的問題。個人覺得: 也許在沒有改用拼音文字之前, 譯名還得用漢字, 注音符號或是拉丁字母只能作爲輔助手段。用在

譯音上的漢字從來就沒有統一過，問題不是新近發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新的人地名大量的對譯過來，用字就顯得更加混亂了。統一的手續包含大大小小枝枝節節的無數技術問題。有的上文已經提過了，有的下文要談到，也只能選幾個比較重要的介紹一下。

(一)審查已經用慣了的譯名，不管聲音合不合。(甲)有的漢名是西人自己採用的，“名從主人”，我們不能改。例如，“文幼章”不能改成 Andicott。漢學家“龍果夫”，“鄂山蔭”都是自己取的名字。再推廣一點說，“泰國”不再是“暹羅國”，我們也得接受。(乙)審查不是考古。決不能把“亞歷山特里雅”改成漢書的“烏弋山離”，“土耳其”改成唐書的“突厥”。最多是近百年來通用的名詞，聲音不合的，先得審查一下。“英吉利”“法蘭西”“莫斯科”“基輔”等等都在其內，看哪些可以保存，哪些應該改譯。刊物上還發現“史大林”那樣的譯名是不應該的。(丙)審查的手續最好通過適當的行政領導。外交文件上的譯名，重要的經濟、政治文件上的譯名必須統一。各專門學科上人地名的譯名，特別是中學外國歷史、地理上的譯名必須趕快整理，通過各專門學會跟中央出版機關。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從今以後，怎樣把新的譯名統一起來。這是用漢字譯音所獨有的尷尬問題。

(二)前人譯名不統一的毛病應該調查一下，因為一經提醒，毛病是很容易避免的。作者就遇見過下列各種情形。(甲)精神不能貫徹。例如，Донбасс，中譯《聯共黨史》254頁作“頓巴斯”，293頁作“頓涅茨”，296頁作“頓巴斯”，297頁又回到“頓涅茨”。其實Донбасс只是Донецкий Бассейн的簡稱。用兩個譯名，大可不必的。(乙)同名異譯，聲音相近，可是前後用了不同的漢字。Омск，《聯共黨史》280頁“阿姆斯克”，290頁“鄂木斯克”。這樣的前後參差，是在無意之中產生的。至少同一種外國語的同一個音宜乎用同一個漢字對譯。(假若守住這個原則，我們就不能為女人的名字造“女旁”字。例如現在把俄文-ова的ва譯成“娃”。那末像Чикобава教授的ва也譯成“娃”麼？幸虧中國出了一位“崔八娃”。但是“女旁”字總是以不用為妙。(丙)外文裏有的音實在太不容易用北京音對譯。假若隨時應付，沒有一貫的原則，勢必至於自相矛盾。也不妨舉兩個例子說一說。俄、英、法、文的[z]北京人不會唸。現在一般的把它當作p譯，這倒是不礙事的，只要大家同意。z, s當p譯，ts, ɲ當t譯，也沒有衝突。所難的，用同一手段去應付德文的s跟z，(實在的音是[z]跟[ts])，就一點沒有辦法。更難的，現在用p對s，只限於sa, so等

弘元音音節上。在se, ze等細元音音節上，《史》就用了p, ɲ, ɲ, ɲ, ɲ五種聲母。再像ɲ, 北京音也沒有。《聯共黨史》的譯法大致是成注音符號的“l”，相當於俄語的л, л跟л是不相容的。此外還用了ɲ, ɲ, ɲ。問題倒不在正確不，在乎譯字的元音的不統一。(丁)音節能一致。外文的地名有時候一半有意義，一半無義。New York譯“紐約”，New Zealand譯“新西蘭”在用慣了。《聯共黨史》在這點上最講究，不惟無文的混亂。Новороссийск譯“諾沃羅西斯克”，全可以意譯的“新城”Новгород也譯“諾沃哥羅德”但是有時候又遷就了舊譯名，закавказь譯“南高加索”274頁忽然出現了“三仙巷”。(戊)太長的人地名喜歡縮譯。例如Roosevelt譯“羅斯福”，短了字，寫起來很方便，但是我們沒有訂出縮譯的矩來。要訂也並不容易。各人做各的，就會變八門。反過來說，也有因為唸錯了音，增多錯誤。Eisenhower的音近乎“艾森豪厄”，現在譯成“威爾”，添上一節半尾巴。

上文舉了些《聯共黨史》的例子，因為這本作的譯本在人地名的譯音上，一般的是嚴謹效法的。別的譯文，不論是不同的人譯同一本，或是同一個人前後譯不同的書，無需乎求全責備。像亂用方言，或是把原音唸得雜七雜八的，無關重要的差別，這裏也不必討論。要避免一切困難，唯有訂出一整套大家公守的譯音。

(三)用漢字譯音的條例也必須遵守起碼上文說的。(甲)必須嚴格地根據北京話，不兩意的。不能只是一般的用北京音，可是難，就借用方言取巧。例如蘇州人不能見了就譯“吼特”，廣州人見了Кремль就譯“克廉”必須把北京話的整個聲韻系統分析一下，並一音節上所能用的漢字列成一張大表，然後不太難寫、難認、難看的字。(丙)同一套條例用到好些種外國語上。目前應該討論的，可以英、德、法四種語言。

(四)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可以考慮照顧方言並不是借用方言的音或是方言音讀的。北京音的不足，這是上文否定了的。先用一說明所要作的事：比如si北京人不能唸，“昔”或者“希”，唸出來都是ɕi。但是在可數的漢人唸起來，“昔”是si，“希”是ɕi或末，“昔”就比“希”合適得多，因為北京人經麼，而上億的中國人沾了便宜。望將來看，



的完全統一，或是民族語在聲韻方面的完全統一，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內，“昔”是爲了多數人服務的，它也服務於北京人，只是很勉強罷了。“希”不能爲北京人服務得更好，又徒然叫上億的人爲難。這樣作也絕不會妨礙民族語的統一。大不了是將來山東人、江蘇人、浙江人……都把“昔”改讀成*si*，就是像北京話似的。並且很可能的，到那時候，漢字早已廢棄了。

然而這樣照顧方言，並不能輕易做到。外國語不單有*si*還有*xi*。我們所做的不是在“昔”“希”之間選用一個，是兩個都用上，“昔”譯*si*，“希”譯*xi*，一部分山東人唸起來正合適，上海人唸*si*跟*xi*，北京人唸*xi*。所以照北京音讀，譯字表上，就發現兩個完全同音的字，並且除非是唱皮簧戲的，通古音的，誰都不能分辨哪個字讀哪個音。強記一兩個字還可以，實在得強記兩整套同音字。因爲*si*一方面可以推演成*tsi*, *ts'í* (*dzi*) *si* (*zi*)，又一方面推演成*si*, *ia*, *sie*, *sio*, *siu*。當然，只有翻譯工作者才需要學會這兩套，唸書的人不必學，把兩套唸成一個樣子並不礙事。但是最大的難處還不在乎唸字，也不在乎用字，是在乎選字。常用的漢字就只有一兩千個，按音節列表，表上會發現好些空白，兩套音不能都具備常用字。編造譯字表的人就得選用比較生疏的字，甚至叫譯名看起來很不像樣。這還是好些問題之中的一個（雖然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爲牽涉大多數漢人）。要照顧的問題越多，常用漢字越是不够用，北京人唸起來越是會覺得同音字太多。就是這樣，還是不能照顧到各個方言區的人。照顧方言的問題有大有

小，需要照顧的人有多有少。最多只能說儘量的照顧，把比較常用的漢字用完了爲止。要不然，開始就不想照顧，北京人倒可以少用好些同音的譯字。要不要做，得由大家公決。

（五）作者的願望是儘可能詳細的造一套譯字表。不單是要照顧方言，並且把外國語裏有些重要的分別，不是漢語的任何方言所能辨別的，也附帶着照顧到，用不同形體的（當然不可能是不同讀音的）漢字表達出來。例如俄英德法文都分*l*跟*r*，*l*讀得差不多，*r*代表很不相同的音。有一個時候，中國人譯梵文的*r*是在譯*l*的字的旁邊加個“口”。我們也不妨試試。

那樣的一套表大多數翻譯工作者決不會全部接受。那末，我們在適當的領導之下，大家交換意見，集體批評。假若不分*l*跟*r*，表上就刪去一些字。假若不必照顧方言，可以刪去的字更多。假若照顧一部分，就刪去一部分。先把各個問題原則性地提出來，造一套煩瑣的表，然後把問題逐一討論，修改總表。心裏得有個底子：就是最基本的原則也可以暫時保留，譯字不妨有例外。比如絕大多數人也許會贊成用北京話的送氣字譯外國的清音，用不送氣字譯濁音，就是上文說的用*p'*對*p*, *p'*，用*p*對*b*。但是在個別的字上大家可能覺着這樣作不方便。例如現在 *Павлов, Баку* 都譯“巴”。那末，連用北京話做基礎的原則都犧牲了麼？總希望這樣的例外不太多。大家通不過，光談原則也沒用。一定有人“原則都贊成”，某些字看不慣。

把譯字先統一了再說。有表可查，譯名就統一了。等到拼音文字推行之後，或是注音符號之類戰勝了漢字之後，那一套表就完成了任務。

## 關於外國人名地名用注音字母譯音的幾個問題

彭 楚 南

大家同意，外國人名地名（少數例外）和一些個專門名詞是不便意譯，只好音譯的。漢字譯音就有很多困難和缺點，大家談得很多了，這裏不再談<sup>①</sup>。總的一句話，就是漢字譯音“不統一”，“很混亂”……。“統一”是大家的最低要求，爲了譯名的統一，學者專家們化費了很多的精力來研究，也提出了不少辦法。

統一音譯譯名的方法不外兩大類型：在漢字上面求統一和走拼音的道路。在漢字上面求統一，大家花的精力很不少，可是事實證明此路不通。例如1924年就有人曾經提議用下列固定的漢字對音：*k* 克、*g* 個、

*t* 特、*d* 突……等，照他的辦法，*kri-* 的音一定譯成“克哩伊”，*van* 的音一定譯成“佛愛恩”。現在恐怕沒有多少人記得這個辦法了。約二十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當時我國人所接觸到的外國人名地名在這厚厚一本表上幾乎都有了“一定的”譯名，照理應該人手一冊，譯名可以希望統一了；但是由於檢查記憶麻煩，還是沒有收效。更

① 請參閱《翻譯通報》創刊號到最後一期（1952年七月號）。幾乎每期都有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有些文章至少也揭發了漢字譯名不統一的現象。又請參閱本刊本期的幾篇文章。





也許人們會這樣說，“注音字母本身也有缺點，也不能統一”。不好的拼音文字的缺點有幾種：是像日文假名一樣不便表示輔音或輔音不夠，如 Глaб, Гуpаб, Гулaб, Гpабу, Глaбу, Гулaбу 和 y 等等在日文都得寫成 グラブ，譯名雖然統一，些糾纏不清。另一種是字母同音而拼寫法不統如日文假名 キヨウ 和 キョオ 發音相同（這一毛病字，只是不如漢字嚴重吧了）。注音字母不同於，這些毛病都沒有。當然，爲了統一譯名，應該爲重要的外國語文規定一套簡單完整的方案。比如 i, p 在注音字母裏用 **ㄐ**、**ㄌ** 來區別，儘管 **ㄌ** 讀成文字上統一了，就達到咱們的最低要求。可能還有人會問，“注音字母的譯音唸不出來怎麼”固然，北京音的韻尾只有元音和 **ㄣ**、**ㄨ**，南方方言不過多了 -m、-p、-t、-k、-ʔ 幾個，遠還不够表達人名地名的音，一般人也沒法發出複輔音 pl, pr 爲了避免像日本假名一樣的混亂和糾纏不清，人名的音最好儘量照原文的字母譯，如 pla, pra 譯 **ㄌㄧㄚ**、**ㄆㄣ**，發音則可以照字母 **ㄌ** 的名稱 (**ㄌ** 讀

還得說明一點，音譯問題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有些問題是一般的，不是注音字母所特有的，任何拼音文字或漢字都有的，像“名從主人”、“某個外國名詞翻譯者不會唸”、“本國音不夠完備”，“改用拼音叫讀者不習慣”等等，都不應該單獨加在注音字母頭上。目前漢字譯名實在有很多是不負責任的，改成拼音文字譯名，就要求翻譯工作者多懂一些東西，要求他們更認真負責，這是合理的要求。

如果是爲文字改革着想，爲工農大眾着想，現在就有條件地部分地採用注音字母音譯人名地名，逐漸加以推廣，那是完全可以而且是有好處的。

外來學術名詞應在什麼原則上統一起來？

外來學術名詞譯法的混亂，是翻譯工作者和譯文所異常熟悉的事，現在姑且舉幾個筆者所曾遇到一個俄、英、漢語的名詞來看看：

這種混亂現象，當然不能任其繼續發展，學術名詞必須統一，那是沒有疑問的，但究竟應該怎樣統一，却是意見分歧，其中以音譯和意譯兩派的主張爭執得最厲害。我以為已經採用得很廣的意譯名詞，如電話、電報、發電機等等，再改成音譯是大可不必的，恐怕也沒有人如此主張。但是反過來說，要把每一個外來學術名詞都用漢字意譯出來，也不是最妥善的辦法。由於目前極大多數名詞是意譯的，並且有很多人根本反對音譯，所以，我這裏僅把我認為應該採用音譯的名詞，分類敘述如下：

1. 羣衆已經用慣了的音譯名詞，如阿莫尼亞，瓦斯，維他命，配尼西林，坦克，雷達；
2. 技工已經熟悉的名詞，如 stator, rotor, magneto, 幫浦(pump)；
3. 某些意譯不能達意的名詞，如 alnico, permalloy, nichrome, manganin, constantan 等等；
4. 比較新出的名詞並且是國際化了，如 amplydyne, betatron, cyclotron, ignitron, magnetron。

электромашинный усилитель	amplidyne	1. 電機放大器 率放大器 電機	2. 功 3. 微場發
реле	relay	1. 繼電器 3. 電驛	2. 替續器
резонанс	resonance	1. 共振	2. 諧振
статор	stator	1. 靜子 3. 固定子	2. 定子
скалярная величина	scalar quantity	1. 無向量 1. 標值量	2. 數量
вектор	vector	1. 向量	2. 矢量

總括一句說，學術名詞應在下列原則上統一起來：

1. 一般用得已經很久而沒有被人發現有什麼不妥的意譯名詞，應該照舊保留。如同一名詞有兩種或更多的不同譯法，如 relay 譯作繼電器、替續器、電驛者，應採用流行最廣的名詞（此處爲繼電器）作爲標準。

2. 屬於上列四類中之一者，一律音譯。

至於音譯名詞的寫法，我以爲不必作硬性規定。在一般通俗讀物中可以用漢字或注音字母；在中等學校以上的教材中或專門著作中，如果有較統一的注音字母寫法，當然應該採用，如果一時作不到，個人認爲直接用拉丁字母書寫也未嘗不可。因爲技術著作中離不了算學公式，公式中符號總是用拉丁字母寫的。

## 統一譯名的迫切需要

王仲聞

現在譯名的混亂情況，不能不說是相當嚴重的。由於譯名的不統一，許多名詞成了絆腳石，使得讀者們感覺到困難，而且由於譯名混亂而發生的問題，一般說來，是不能由讀者們自己來解決的，至多也只能夠解決一部份。因此，譯名的統一，是廣大的讀者羣衆普遍而一致的要求。針對現在的譯名混亂情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曾經邀集各科專家進行統一譯名工作；在《翻譯通報》內曾經發表過《世界各國國名首都名英漢對照一覽表》，新華通訊社已經採用表內譯名發稿。但是其他名詞如人名、地名、學術名詞等還沒有一個初步的統一譯名標準，雖然此種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可以說，統一譯名工作已經開始，不過還需要長期的繼續努力。

分析現在譯名混亂情況，大致有下面八種原因：

一、沒有標準 例如“輕氣”與“氫”，“生產手段”與“生產資料”，“意識形態”與“意識形式”，“邏輯”與“論理學”等等，有的不同譯名多至三四個。

二、譯者粗心大意 在同一書內，對同一名詞，有多種的不同譯法。列寧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壽山斯克村（根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最近《人民日報》的譯法），在人民出版社的《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譯本內有三種譯法：（1）蘇辛斯科伊村，（2）蘇舍斯克村，（3）蘇辛斯克村（此外，《列寧生平事業簡史》譯作“壽山村”，《羣衆》雜誌譯作“舒新斯科野”）。與馬克思恩格斯同時的德國庸俗唯物主義者布赫納爾，在人民出版社的《新編哲學史》內也有不同譯法（一處作“布赫納”，少末尾的“爾”字）。三聯書店的《個人與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對於馬克思，有的

既是中等以上程度，見了拉丁字母名稱不會不認識。

最後我想說出一點意見。由於中國文字一向不拼音的，用漢字書寫的意譯名詞使我們能望文生義，便於記憶，自然有其方便之處，然而因此也就限制了我們吸收外來語（專指音譯的），並在譯名統一上增加了困難。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必須改成拼音文字，已是無可懷疑的了。一旦實行了拼音文字，意譯名詞的文生義的一點作用行將消失，而由於採用古代文字爲根，不注重一個詞在口頭語言上的清楚明確的缺點，要暴露出來，使得採用拼音文字書寫，發生某些困難。

今天在文字改革的前夜來討論學術名詞的統一問題時，這一點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地方譯作“馬克斯”；希臘神話裏面的大力士的譯名在這本小冊子內，上頁與下頁，相隔兩三行就完全不同，一作“赫邱利”，一作“格拉克”，使人無法了解，啼笑皆非。《人民日報》對於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有名的經濟學者），以前譯做“奧斯特洛維茨夫”（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譯文），最近譯做“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根據新華社稿內譯文）。同一著作或同一報刊內有不同的譯法，讀者怎樣感覺，是不言而喻的。

三、譯者各行其是 由於沒有標準，譯者各異其是，在不同的譯作裏面，譯名不同，原在意料之中。如在1952年中蘇友好月來到中國的蘇聯藝術科學作者代表團，是以“吉洪諾夫”爲首的（譯名根據《人民日報》），以前新華書店的《蘇聯文藝問題》譯作“吉諾夫”，東北新華書店的《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方向》譯作“鐵霍諾夫”外，又另譯作“吉霍諾夫”，一個人已有兩種譯名了。三聯書店出版的《個人與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與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出版的《個人與人民大衆在歷史上的作用》是蘇聯哲學家康士坦丁諾夫同一著作的兩種譯本，內引入名很多，以兩本對照，書內所引的人名約一百二十個，不同的約五個，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相同的不到百分之四十（此種情況，多半是由前一種譯本的譯者工作態度不夠嚴肅認真所造成）。

四、編者注意不夠 同一人物的不同譯名，譯者不同，但編輯部門是可以發現而設法統一的。編者有時似乎注意不夠。《學習譯叢》對法國物理學郎之萬，一次譯作“藍惹文”，一次作“朗席萬”；又



人同一篇文章，一次譯作“杜加林諾夫”《論客觀世界的規律與科學規律》，一次譯作“杜卡林諾夫”《論客觀世界的法則與科學法則》。如果編輯同志予以注意，這種現象是可以避免的。

五、人名地名由別種文字轉譯 俄文往往以字母“T”代替他國文字的“H”，以“B”代替他國文字的“U”，其他字母讀音也有不同的。因此由俄文轉譯的名詞，如譯者不加注意，就很易失真。美國的“聖勞倫斯河”在三聯書店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內照俄文讀音譯作“北拉弗梭西河”（“聖”作“北”是完全錯誤的）。羅馬的皇帝“奧古斯都”照俄文直譯變成了“阿佛古斯特”（三聯版《個人與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變成了“蓋格爾”（出處忘記了）；俄國的革命家思想家“赫爾岑”變做了“蓋而忒”（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列寧文選》中譯本）或“蓋而真”（東北新華書店的《聯共（布）黨史參考資料》）；英國上斷頭台的皇帝“查理一世”變成了“卡爾一世”（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蘇聯土地國有制》中譯本）；上面第二項所提到希臘神話內大力士“赫爾克里斯”（照人民出版社的斯大林《論黨工作底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辦法》中譯本），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變成了“蓋而枯里斯”；美國紐約的黑人居住區“哈萊姆”變成了“喀爾列姆”（人民出版社的《美國生活方式》）。至於我國元朝“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譯作“巴弟”或“巴提”（《個人與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羅馬歷史上最著名的帝王將相中的“愷撒”譯作“齊查利”（全上書）。這如果不是喜歡標新立異，就是太不負責，故意使得讀者迷糊了。

六、俄文詞尾變化 各種名詞在俄文中因品詞不同或格的不同，需要詞尾變化，譯者不負責任地一起音譯，常常令人莫名其妙。希臘時代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只要讀過古代外國歷史，恐怕沒有人不知道他的，三聯書店的《個人與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將俄文的“馬其頓亞歷山大”譯做了“阿歷山大·馬其頓斯基”，而且以爲他是姓“馬其頓斯基”名叫“阿歷山大”的；又人民出版社的《國際私法》中譯本將“布爾邦王族的西班牙遜王亞爾方朔第十三世”譯作了“阿爾馮斯·波爾達斯基”，也以爲他姓“波爾達斯基”了，這種譯法真可以算是笑柄了。《新約全書》裏的耶穌門徒出賣耶穌的，一般譯作“猶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譯作“猶達施卡”。一般的人名地名的譯名，對於整句的意義很有關係，如果這個譯名令人莫明其妙：整句意義也要搞不清楚。“猶大”譯名可能已是陌生，“猶達施卡”就令人莫名其妙了。我想讀過《聯共黨史》的

人，讀到列寧稱托洛茨基爲“猶達施卡，托洛茨基”一句，除非不求甚解，是不會不發生問題的。上面說的這種詞尾變化，譯音時是非去掉不可的。

七、自我作古，不照習慣 有的名詞已經習慣使用，不須另出心裁，但是仍有人自我作古，閉門造車。列寧的《論歐洲聯邦口號》，已有中譯本（《列寧文選兩卷集》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單行本），三聯書店出版的《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把這個名稱改譯做《論歐洲合衆國口號》。至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譯本的譯名，新華書店及人民出版社翻印的，除一兩處文字稍有改動以外，可說“一字不易”，但其譯名中的“簡明教程”却改成了“簡要讀本”，不知道爲了什麼要使它一書而有兩個名字。

八、沒有參考舊的譯名 法國的“內閣總理”，其地位等於英國的“首相”。外國文字的原文可以相同，但是習慣上譯名不能英法互易。三聯書店的《政治經濟學》把“法國的內閣總理”譯做了“法國的部長會議主席”（曾經有人譯做“法國首相”，已在《翻譯通報》內受過批評），在同一書內又把“英國的下議院”照美國制度譯做了“衆議院”（在俄文是沒有分別的）。至於羅馬時代的皇帝名稱（自奧古斯都開始的）有人音譯作“愷撒”（仿朱理安·愷撒譯法），已有問題，還有人譯作“意皇”以爲是“意大利的皇帝”，那完全是錯誤了。這種錯誤，只要多找工具書，或多參考他人的譯品，是可以避的。

上面所舉的這些例子，只能說明譯名混亂的局部情況，因爲它的範圍不廣，只就本人平時所看到而記下的材料一部份中選出了幾個典型例子（例子很多，舉不勝舉）。假使我們廣泛地收集一下，一定還可以發現不少的驚人的材料。祇從上面所舉一些材料來看，譯名的不統一，是帶來了不少損害的。這種情形，在我們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在必然即將隨之而到來的文化建設的時候，是必須停止的了。譯名統一工作，已成爲迫切需要，刻不容緩的了。各出版和新聞工作同志應當提高政治水平，加強責任心，處處爲廣大人民着想，克服粗枝大葉作風。在業務技術方面應當多向他人學習，多找參考書，儘量利用習慣已久的譯名，不要自我作古。即使不合理的譯名，只要沿用已久，人民已無誤會的，如“夏伯陽”（應當譯“却伯也夫”）也可以不改。讀者們也應當負起責任，對於各種出版物的譯名，隨時提出意見，幫助各出版社和各報社改進工作。

# 拼音文字和漢字的比較

## 拼音文字在出版技術上的優越性

陳 越

### 一 漢字限制着對最新印刷術的接受

我曾就漢字、拼音文字在打字術和活字凸版印刷術等方面作了一些比較研究<sup>①</sup>，現在再進一步看看這兩種體系的文字在其他印刷、出版技術上所起的作用是什麼樣的。

在外文書籍中，我們偶然會發現這樣的版本：所用的字體是一般的打字體，印刷質量略比鉛字印刷差。這些書籍是用普通打字機打好了稿子，通過石印或膠印印製出來的。它的特點：排版過程簡單，印製成本低，往往有些作者寫了稿子，由於是專門性的著作，銷數不很多，或者是政治上進步的作品，找不到願意接受出版的出版商，於是自己一手包辦打字、校對的工作，自費交由印刷廠印製。雖然印製質量不太好，却同樣達到了出版的目的。這是活字平版印刷術比較原始的低級的形式。

根據這一原理，近年來美國出現了一種“凡利排字機”(Vanityper)。它最初出現於芝加哥，是印刷廠老闆爲着打擊排字工人罷工拿出來的法寶。這種機械利用特殊設計的打字機來打字，打出來的字體比一般打字機清爽，質量相當於在鉛字上打出來的清樣；全副字體有50種，共有600種大小不同的字母樣式；打出來的稿子是一條連續的紙條，把它按照規定的版式黏貼起來，經過普通的攝影製版手續就可以印刷。這種排字工作任何打字員都可以做，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排字工人；標題、題花、插圖、花邊等美術裝飾，都可以在稿子上任意添繪，不受鉛字限制並且不必另外製版。

這一原理的繼續發展，產生了達通式的“攝影排字機”(Photoline)和石井茂吉式的“寫真植字機”。它們用一塊印上各種樣式字母的玻璃或透明紙代替了全部鉛字；把透明字母樣版上某一個字母移動到特定的鏡頭對準的位置面前，按動鍵子，那個字母就被攝進感光的底片(Film)上；同一個字樣，利用弧度不同

的鏡頭和鏡頭距離的遠近，被攝成的字母可以放大、縮小或成爲□□\等不同的形狀。更進一步的Fotosetter式攝影排字機，打字員一邊打字，底片一邊被移到另一部門自動進行沖洗；稿子排好的時候，底片跟着就都沖洗出來，把底片連接起來就可以直接用來製版。

漢字也有打字機，漢字打字機也有可能利用於活字排字術。但由於漢字的字數無限量地發展，字形結構的疏密又距離太遠，打字效率不高，缺字現象不可避免，字模設備費用大，以及打出來的字樣不可能勻稱調和，這些基本的缺陷限制着我國印刷術對於國際最新技術的接受，使得我們對新鮮事物的接受不能不打若干折扣。儘管活字平版印刷術目前還存在着某些缺點和必需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如排好了的版子改動較困難，設備費用較大，不能利用現有的凸版印刷機等），但人類的書寫技術由手工書寫發展爲機械書寫，由單手書寫發展到雙手打字，印刷技術由雕版發展到活版，由凸版發展到平版、凹版<sup>②</sup>，這是客觀存在的事物發展規律。在國家進入大規模經濟、文化建設的今天，如何更有利地吸取先進各國的技術，加速我們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使進步的排字印刷技術爲佔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服務，這個問題值得嚴重注意。

### 二 漢字不可能很好地利用簡單複寫技術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對於最簡單或比較簡單的複寫技術，漢字和拼音文字所產生的效果怎樣地不同。

最簡單的複寫方式要算利用複寫紙複寫了吧。由於漢字打字不可能不是專業的，較偏遠或較小的機

① 《中國語文》一九五三年五月號《拼音文字在打字技術上的優越性》，六月號《拼音文字在活字凸版印刷術上的優越性》。

②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普及本就是用手工排字，攝影製版，利用平版印刷機印製的。



關、團體一般還未具備利用它的條件，工作人員不得不整天苦幹，光憑一隻手一筆一筆地抄寫，既吃力，又寫得慢，寫不好，複寫份數少；就算使用漢字打字機，也追不上外文打字機的速度、質量和份數。

其次要算油印。我國的油印技術確有它特殊的成就。大家都很熟識，過去在解放區出版的油印報刊，版式那麼整齊活潑，套色彩印的地圖或宣傳畫，驟看起來同石印、膠印無多大差別。革命工作者們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利用最簡單的工具，爲廣大羣衆創作出那麼優美的文化食糧，他們的勞績是應該肯定的。近年來，機關、團體、學校的油印品，刻字油印的逐漸少見，它大部分被打字油印代替了。今天的油印工作，客觀條件已經不再容許慢吞吞地刻寫和印刷，時間的要求是快，數量的要求是多，自然地打字就代替了刻字，機械化的油印機代替了簡單的手工工具。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一些書刊\*，驟然一看，很難令人相信是在戰爭環境中出版的讀物，更不敢輕下判斷認定它是打字油印的產品。同樣是打字油印的出版物，在紙張利用上，質量上，閱讀效率上，兩種不同體系的文字所產生的效果差別是相當遠的。事實證明，漢字也不能很充分有效地利用簡單的複寫技術，像拼音文字那樣。

### 三 漢字不是服務於寫作的理想的工具

文字應該是忠實地記錄語言（當然要經過提煉），充分地表情達意的社會交際的工具。漢字不能盡它的基本任務——記錄生動活潑的語言，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對於有能力“振筆疾書”，“倚馬可待”的人們（這種寫作態度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要一筆一筆地寫着筆劃繁多的方塊字，寫字的速度往往落後於思想的發展，寫給自己看的日記、筆記等草一點還是自己的事，如果寫給別人看的文稿、報告等，至少寫到要別人看得懂。可是爲了要寫得清楚整齊，思路就難免受到了阻礙，不能順暢地進行。

對於要反覆修改，數易其稿的作者，打初稿已經吃力，特別討厭的是謄寫，尤其是要複寫存底的。目前國家的工作人員中，就有不少人花了不少時間在公文、報告、總結、計劃等謄寫的工作上，而各個部門都在喊幹部缺乏；我國的寫作和翻譯工作者絕大多數還不可能做到職業化，他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的一部分從事著譯工作，却得花去不少的時間、精力在原稿謄寫上面，而出版界都在喊著譯力量不夠，羣衆都在要求他們產生更多更好的產品。

一方面國家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要求是厲行節約，增加生產，減少行政費支出，一個人做幾個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求寫出來的文稿既要內容正確，又要一字不苟，字字工整。這是一個很不調和的矛盾。很明顯地，漢字的結構複雜束縛了腦力勞動者生產的發展，使得他們的不少時間、精力浪費在寫字抄字上面；雖然這筆損失一向不被人們注意。

在先進各國，情況就大不相同，打字成爲一般人都可以掌握的生活技術，成爲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備一定文化教養的人們，他們寫信、寫文章可以直接用打字機代替手寫；就算要謄寫，打字比手寫既省力，又迅速、清楚。我國的打字技術，幾乎成爲機關裏文書部門中少數幾個人的專業，由於它字數太多，難學難用，一般人都不能運用，非專業的人們使用它，“一曝十寒”，效率比手寫還要慢。

### 四 漢字使編輯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難

拼音文字是用幾十個字母排列而成的，止要把字母寫得好，整個詞也就寫得好；漢字是由、一丨ノㄣフ等所謂基本筆形錯綜複雜地組織成的一個整體的圖案，單從字形上講，漢字一個字就相當於拼音文字的一個字母，學好了、一丨ノㄣフ……的寫法不等於就可以寫好字，我國的老師教學生“書法”，從來不花較多的工夫在教寫、一丨ノㄣフ……上面，就是有力的證明。

“書法”這門學問，我國古代的讀書人是很重視的，可是要求窗明几淨，一生一世下“臨池”工夫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古代讀書人大多數是寄生階級，他們有條件可以這樣做；今天的學生，要學習的知識那麼多，那有閒情逸致下練字的工夫？離開學校參加社會工作後，忙於工作之外，還得忙於學習，更不用說了。漢字書法逐漸退化那是現實發展必然的結果，這不應怪誰，責任要由漢字自己担負。當然，我們並不反對要求字要寫得齊整些，起碼要做到讓別人一看就懂。

由於上述的原因，編輯工作者可就苦了，特別是最接近羣衆的處理人民來信的工作人員。來稿來信的字體可真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門，一個人一個樣。就整個字的面貌看，除少數寫得平整的之外，本來正方形的字面，被寫成各種不同的菱形（◻◻◻◻）；就字的體材看，很少的稿子不夾雜着行書、簡體，由完全沒有道理可講的簡體的“𠂇”以至任意杜撰的所謂合成字“𠂇”“𠂇”等等。編輯工作者不光要具備一定的政

\* 越南文是拼音文字，用的是拉丁字母。——編者註。

治、文化和業務水平，還得是一個“文字”學者，這可能是我國編輯工作者特有的負擔。

在審讀稿子的時候，要集中注意力在檢驗政治、科學、藝術方面的質量，同時却非要做“認字”工作不可。這不僅工作效率低，更嚴重地是分散精力在“認字”上，因此往往忽視了更重要的內容方面的質量。精力白費了，無補於出版物質量的提高。

一般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的編輯工作可就輕鬆多了，來稿絕大多數是打字的；就算碰到一些手寫稿，反正止有幾十個字母，無論怎樣，辨認起來總比近萬個不同的符號——漢字容易。根據蘇聯現行《標準出版合同》第五條的規定，“著作人將原稿送交出版社時，必須是用打字機打成，或者是非常清楚的手抄本。出版社經常總是要求著作人用打字機打成，每行字之間留出一行空白地位，打在每頁的正面，不得塗改，並須標明頁次<sup>⑧</sup>。”因為出版社與印刷廠間的原稿整理技術規則也有共同訂定的明確的規定：“交付印刷廠排版的文字原稿，應該清楚地用打字機打出。”“在原稿上允許不超過五個以上文字上的修改和用手在原稿上面修改。修改數量多的，用手寫加入脫漏或修改文字的那幾頁，應該重新在打字機上整個地謄清<sup>⑨</sup>。”如果接受的是手寫稿，出版社也得付出一筆加工費，打字謄正，否則印刷廠一般是不接受印刷的。

我國也有漢字打字機，可是打字不可能不是專業的，不是一般人所能適用，作家們即使買得起它，也無法使它服務於直接寫作或間接謄寫。

## 五 漢字阻礙了校對工作的機械化

原稿經過了出版社的編輯部交到印刷廠，接着的工序是排字、校對。

人們都很佩服中藥舖的掌櫃先生們，他們看得懂“龍飛鳳舞”的藥方，迅速而準確地從各個小抽屜裏取出所需要的藥材來；事實上，排字工人就比他們更加高明，左手拿着無論寫成怎樣的稿子，同樣迅速地從字架上取出鉛字來。十萬個字至少有幾萬個樣子，一般人有誰理解到他們在苦練過程中受到的痛苦！

稿子排成鉛字以後，校對員認字的苦頭似乎比排字工人吃得少，其實他們的責任更重，不光要注意糾正排字工人工作上的錯誤，讀者還要求他們不要滿足於“忠實於原稿”，要進一步發掘編輯、作者原稿上的錯誤。他們既要看懂原稿上各式各樣的字體，又要注意糾正錯排的鉛字，注意力分散，就算責任心較強的，往往也不易完成應有的任務。經過三至若干次反覆校改，（《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版就校過十二次），

在出版物上還發現錯誤，字體的難以辨認是主要的客觀因素之一，如：

（1）世界上最大的獨佔資本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去年公布它已打破一家公司在一年中所能獲得的純利潤的最高紀錄——除清繳一切稅收外，尚有達八三四、〇四四、〇三九萬（美）元之譜的利潤。——《世界知識》第24卷，第12期。

（2）參加揭幕式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馬叙倫、……以及北京各界人士二萬（百）多人。——新華社新聞稿 1952 年 12 月 27 日。

（3）黃泛農場今年種了四百（萬）多畝小麥，一週內全部種上，出苗整齊，長得好，超過當地羣衆的小麥產量。——《長江日報》1952 年 12 月 28 日第 2 版。

（4）全國領土面積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萬（方）公里（舊估計十一萬五千方公里，不確），約相當於……。——《世界知識》第 24 卷，第 14 期。

從這些具體的實例中，不難推想得出：（1）例，排字工人和校對員都把原稿中草體的“羨”誤認為“羨”；（2）例，把草體的“萬”誤認為簡體的“万”；（3）例，却把簡體的“万”誤認為草體的“萬”，剛剛相反；（4）例，又把“方”誤認為簡體的“万”。他們被手寫的原稿累死了，上了漢字的當了，如果是拼音文字，mei ㄇㄟ, wan ㄨㄢ, bai ㄅㄞ, fang ㄈㄤ 彼此字形各不相同，錯誤就不大可能發生。

蘇聯的出版業，對於原稿整理工作是十分重視的。在打字的原稿上，即使要修改，也想辦法使得版面整齊，便利排、校人員工作，他們認為，這是保證出版物質量和加速生產過程、減低成本的重要的技術前提。有一位原稿整理員哈爾科夫曾經利用一種白色樹膠水彩顏料塗抹在字上，然後在被塗抹的位置上進行修改。這個先進的工作法節約重新打字和校對的原稿加工時間的一半，而且避免了重打時可能發生的新的錯誤。退一步講，即使有個別字母排錯了未被發現，拼音文字是由一串字母組成的，錯了一個字母通常不至變成另一個字，不像漢字那樣往往錯了一個字弄得和原意相反或千差萬別。

關於原稿書寫形式與出版工作的關係問題，列寧是十分重視的：“排字工人按照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原稿來排字就容易得無比，因而錯誤就應當少得多，校對工作（這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也就大大輕鬆<sup>⑩</sup>。”

近年來國際間出現了一種“無錯排鑄機”（Error-

⑧ 馬爾庫斯：《出版事業的組織與經營原理》第五章第三節。

⑨ 烏阿羅夫：《書籍、雜誌和報紙校對工作》，《原稿整理工作》篇第二節。

⑩ 列寧：《致親屬的信件》，國家社會經濟書籍出版局 1931 年 版第 150 頁。



typewriter)。它的主要特點是在打字機上附着校對鏡和校正錯字、調整空位和行列的特殊設備。打字一邊打着字，校對鏡一邊自動地進行校對工作，如發現錯誤，紅燈馬上亮起來向打字員告警。一行字打好之後，與原稿相符無誤或修正過了，按動機上的鈕子，全行字就自動地澆鑄出來，成為鉛塊。正如機械工業的自動成品檢驗器一樣，只要原稿正確，通過這種科學的校對儀器，排出來的版子就絕對保證正確無誤。萊諾排鑄機排鑄出來的版子是每行一塊的，要動就得全行重新排鑄過，這種校對儀器的創造，使萊諾排鑄機克服了最大的缺陷，更加完善。千千萬萬打字員的理想實現了，“校對工作能不能機械化”？這疑問，現在已經得到了完滿的解答。

也許有人以為，像向外國購買印刷機一樣，只要有了這種機械，就可以同樣服務於我們漢字的校對工作。可惜事情並不那麼美妙，如果一面是楷書、草書、行書、簡體甚而合成體的混種的手寫稿，另一面排出來的四平八穩的鉛字體，而單靠那幾塊玻璃鏡就能夠把它們逐個分別是非，這實在很難想像。就退一步用在根據印刷稿重排的場合吧，用處狹得多。用說了，機械的本身不是文字學家，也不會翻字，在原稿和校樣上同時出現這些鉛字的時候，它又什麼來判斷它們誰是誰非：

够……夠	鄰……隣	群……羣
裏……裡	峯……峰	颶……颶
吟……含	吧……邑	部……陪
啼……啼	呆……杏	杲……杏

明明是一種先進的科學技術，是一種能夠代替人勞動，生產更精美、更低廉的產品的機械，我們却用不上。漢字是擋住校對工作機械化前途的重要障礙，它使得人們不能成為機器的主人，還不得不從事工業式的生產。我們不是不可能製造出這些機器來（至少可以仿造），而是在不改革漢字的情況下，製出來也無法利用它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 六 漢字限制了出版物生產時間和生產成本的節約

在人民來信和報紙上常常看到這樣的羣衆反映：買的書買不到，要訂閱的報刊訂不到，訂到了往往不能如期收到；配合政治運動、學習運動的學習文等到運動已近尾聲或結束的時候才出版；學校在開課後還收不到教科書。時間性十分強烈的出版物往往成為“馬後砲”、“明日黃花”。此外，書價一般讀者感到負擔重，買不起，書價和現階段人的購買力不相適應，等等。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很

複雜，可是對於漢字本身的缺陷這一帶根本性的因素却一向很少被人注意。

事情很明白，漢字的繁與難，使得我們不可能充分利用機械來改進有關出版、印刷的技術。因為不能利用打字機從事寫作和謄寫，影響了著譯稿件的及時供應；因為要閱讀手寫原稿，限制了編輯工作效率的提高；因為要根據手寫原稿用手工排字，排字速度也受限制；又因為校對工作無法從手工作業提高到機械化：各個工序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整個生產過程時間的縮短，都受到限制，出版物供應不及時和生產成本高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

## 七 我國書寫、印刷、出版技術的遠景是無限美好的

也許有人在懷疑：外文打字機的結構的確比漢字打字機簡單，學習和鞏固都比較容易，打字的擊數比較迅速；但漢字是一個字一個音節的，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要打幾下才打出一個音節來，是否比得上現在的漢字打字機的效率？

如果對於我們偉大祖國的文字改革無限美好的前途描繪得大致不錯的話，這個問題是不難得到解答的。漢語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語言之一，它的音節結構非常富有規律性、科學性。它的每個音節都是用“聲母”“韻母”或“聲母+韻母”表現出來的，用人為的字母記錄下來，就完全有條件可以採用“雙拼制”，即每個音節止有一個字母（“聲母”或“韻母”獨用），或最多不超過兩個字母。又，我們未來民族統一語的基礎的北方話，止有四百數十個不相同的音節，語音並不複雜，用來拼寫它們的字母，數目也不會太多。

這些有利的條件，都有理由可以令我們相信，我國將來的打字機是會同時存在兩種型式的：包括大部分聲母和韻母，約有50個字鍵的，這是普通打字機；包括大部分音節，約有300多個字鍵的，這是專業打字機。普通打字機一擊或兩擊拼成一個音節，一般人都可以掌握；專業打字機通常一擊就是一個音節，機關、團體文書部門的專業打字員使用它，印刷上的打字排鑄機也使用它，效率要比普通打字機高。無論普通或專業打字機，字鍵比現在漢字打字機少得多，又可以雙手同時打字，打字效率自然就會比現在的漢字打字機高得多。

那時候，世界上一切打字、印刷、校對、出版等方面的先進技術，我們都可以全盤吸取過來，加以發揚光大，用以改善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而同一思想內容的文稿，我們的打字、排字速度可能要比一般國家還快！



## 語法講話(十四)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

### 十六 指示詞(續)

#### 4. 哪、哪會兒、哪兒、怎麼、怎樣

這些個疑問詞，和上文說的“誰、什麼”一樣，都有詢問、任指、虛指三種功用。現在分開來說。

(一)詢問——“哪個、哪一個”(或者“哪”加別的量詞或數量詞)一般是要求在某種範圍之內加以選擇。例如：

你兩個爺爺哪個爺爺好？(楊朔)

那種綢緞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曹禺)

你說的那三家，究竟是那一家合適些？(趙樹理)

“哪會兒”也說“多會兒”、“多啗(多早晚)”、“幾時”，是問什麼時候的。例如：

你哪會兒走？

八路軍多會兒來的呀？怎麼見也沒見着，就把崗樓端了？(袁靜、孔厥)

哥哥多啗死的？(蕭紅)

吳天寶來啦！你幾時來的？(楊朔)

“哪兒”、“哪裏”是問什麼地方。例如：

你在哪兒住？

他上哪裏去了？

你這話從哪兒說起？(袁靜、孔厥)

不過在反問句裏，“哪兒”、“哪裏”就不一定有問地方的意思。例如：

人嘛，……哪(兒)能一下子完全改好？思想改造是長期的，慢慢的來。(楊朔)

大水可哪裏睡得着？他心裏打算盤，肚裏拿主意。(袁靜、孔厥)

“哪(兒)能一下子完全改好？”只是說“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好”。“大水可哪裏睡得着？”只是說“大水睡不着”。

“怎麼、怎樣”修飾動詞結構，是問方式的。例如：

你說了這麼半天，可到底怎麼進去呀？(袁靜、孔厥)

就像咱們要鬥爭恆元，可該怎樣下手？咱又不是村裏的什麼幹部，怎樣去集合人？怎樣跟人家去說？人家要說理咱怎麼辦？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趙樹理)

“怎麼”也可以用在反問句裏。例如：

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魯迅)

一個人怎麼背的動？得兩個人搬一架。(楊朔)

你又沒傷着骨頭，怎麼會成廢人呢！(袁靜、孔厥)

“他怎麼會來？”只是說“他不會來”。“一個人怎麼背的動？”只是說“一個人背不動”。這種反問句子，一般只用“怎麼”，不用“怎樣”。

“怎麼”跟“這麼、那麼”一樣，通常不直接修飾名詞，修飾名詞的時候，名詞前面須有量詞或數量詞。例如：

這些人都想看看老楊同志是怎麼一個人。(趙樹理)

這丫頭是怎麼回事，懶懶散散的，動不動發煩。(楊朔)

注意這些地方最常用的量詞是“個”字，如“怎麼個人、怎麼個意思”，別的量詞不大用，只有“怎麼回事”用“回”字。

“怎麼”也可以問原因，多半帶點出乎意料的意思。

例如：

你們瞧小高，年輕輕的，怎麼那樣保守？(楊朔)

怎麼你們黑間半夜還要飯呢？準不是好人！(袁靜、孔厥)

怎麼這屋子這樣熱？(曹禺)

大黑怎麼還不回來？(趙樹理)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教你去打，你怎麼不打？(曹禺)

“年輕輕的，怎麼那樣保守？”表示“年輕輕的，不應該那樣保守”。“大黑怎麼還不回來？”表示“大黑該回來了，但是還沒回來”。最後一個例子，先說“你為什麼不打”，又說“怎麼不打”，可見“怎麼”和“為什麼”的意思相近，可是不全一樣。這種問原因的“怎麼”可以放在謂語前面，也可以在主語前面。

“怎麼着”、“怎(麼)樣”也可以問情況或行動。例如：

小水拉着大水的手兒，問：“哥，你怎麼啦？是不身上不舒坦？”大水說：“怎麼也不怎麼！”(袁靜、孔厥)

你怎麼着？生活過得慣？(袁靜、孔厥)

你怎樣？事情好不好？(老舍)

你們結婚的事情怎麼樣？(趙樹理)

這一家這幾年過得究竟怎麼樣？(趙樹理)

以上是問情況的。

他們究竟對您老人家怎麼啦？(曹禺)

你也走了，我也走了，丟下老人怎麼着？(袁靜、孔厥)

你打算怎樣？(老舍)

你願意怎麼樣？隨你。跟你媽，還是跟我？(曹禺)

以上是問行動的。做補語或賓語的時候，用“怎樣”、“怎麼樣”居多，不大用“怎麼”。這一點跟“這樣、那樣”和“這麼、那麼”的分別相似。

有時候“怎麼”單獨用在句首，表示驚異，作用近似一歎詞。例如：

怎麼，你放她走啊？(袁靜、孔厥)

怎麼，我交給你那三十多塊錢呢？(老舍)



(二)任指——這些疑問詞表示任指的句法有兩類。甲類常常帶有“無論、不管、任憑”和“也、都、全”一類字，例如：

村裏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趙樹理)  
無論從哪方面想，他都覺着驚氣。(老舍)  
送到那裏也不犯法！我不怕他！(趙樹理)  
車長傑悶着頭，由你磨破了嘴，怎麼也不吱聲。  
(楊朔)

可惜是不論怎麼裝也裝不像，還不如不裝。(趙樹理)  
既然來到你這兒，怎麼着你也得留我過一夜。(袁靜、孔厥)

他覺得這一輩子大概就這麼完了，無論自己怎麼要強，全算白饒。(老舍)

“村裏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是說“村裏任何人都由他兩個調遣”。其他可以類推。

乙類句法常常用相同的字眼前後照應，例如：

您哪時到，哪時有您的座兒！(老舍)  
他上哪兒，我也上哪兒！(老舍)  
走吧。走到哪裏算哪裏，遇見什麼說什麼。(老舍)  
他要怎麼就怎麼好了。(老舍)  
反正我管不了你，你愛怎麼就怎麼吧！(袁靜、孔厥)  
我就跟着你們學，你們怎麼着，我也怎麼着。(袁靜、孔厥)

“您哪時到，哪時有您的座兒”，是說“您任何時候到，都有您座兒”。“你愛怎麼就怎麼吧”，是說“隨便怎麼都行”。其類推。

(三)虛指——所謂虛指有各種情形，或是不知，或是不起，說不上，或是不必明說。例如：

多會兒環境好了，怎麼着也要常來看你們，你們是我的恩人啊。(袁靜、孔厥)  
可是那聲“祥子”在他心中還微微的響着，帶着溫柔親切，似乎在哪儿曾經聽見過。(老舍)  
咱們的人可不知都在哪兒，怎麼能跟他們取上聯系才好呢。(袁靜、孔厥)  
你說去那裏咱就去那裏，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趙樹理)  
他先把介紹信給恆元看了，然後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土氣。(趙樹理)

## 十七 數詞、量詞

量詞通常用在指示詞或數詞的後面，名詞的前面，比如“桌子兩個人抬不動”，“張”字“個”字都是量詞。數詞加詞可以簡稱數量詞，如“兩個，一張”。

### 1. 數詞——基數、序數

數詞有基數序數的分別，基數表示數量多少，序數表示先後。比方“三”是基數，“第三”是序數。“三個”比兩個多一個，比四個少一個；“第三個”在第二個之後，第四個之前，只是一個。“第三個”也可以說成“第三一個”，或“第三個”。

漢語的數目是十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一千，一萬，十萬，一百萬，一千萬，一萬萬。一萬萬就是一億。個位數放在十位數前頭是“乘”的關係，放在後頭是“加”的關係。“十二”是“十加二”，“二十”是“二乘十”，“三十六”是“三乘十，加六”。其他依此類推。比方說，“三百六十五”是“三乘百，加六乘十，加五”。用“萬萬”計數有兩種說法，“五萬萬五千萬”是“五萬萬加五千萬”，“五萬五千萬”是“五萬五千乘萬”，都是五億五千萬。三位或三位以上的數字，要是當中有空位，就加個“零”字。例如：“冬至到清明一百零六天”，“地球赤道的圓周長四萬零七十六公里”。還有一類“零”字可用可不用，如“三年零六個月，四個月零十天，三畝零二分地”。

數字前頭加“第”字就造成序數。例如：

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剛剛嫁給于福，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趙樹理)

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

這是無疑的，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麼？(毛澤東)

“第一”也可以說成“頭一”：

這年正月初十，銀花生頭一個孩子。(趙樹理)

表示年月的第一有專用的說法：

公元元年是漢平帝元始元年。

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到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趙樹理)

表示排行第一用“大”字：

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魯迅)

序數也不一定要用“第”字。日期不用“第”字，如“八月二十二日”。排行不用“第”字，如“二哥，三哥”。編號普通也不用，如“三樓三十二號”。分類、列舉也可以不用。例如：

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毛澤東)

三仙姑去尋二諸葛，一來爲的是逞逞鬧氣的本領，二來爲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趙樹理)

墨子在歸塗上，是走得較慢了，一則力乏，二則脚痛，三則乾糧已經喫完，難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匆忙。(魯迅)

即使不用“第”字，基數序數還是有分別，不會混淆的。比方說“三弟”是“第三個弟弟”，“三個弟弟”不能說成“三弟”。

### 2. 二、兩

“二”字“兩”字用法不全一樣。序數只能用“二”字，不能用“兩”字。比如“第二層樓”是“二樓”，不能說“兩樓”。量詞前頭用“兩”字，也是限於基數，而且限於單用。比如“兩個孩子”，“兩”是基數，又不跟別的數字結合。“第二個孩子”和“十二個孩子”，“二”字都不能改成“兩”字。又如：

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魯迅)

兩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後人民鬥爭的勝利開闢了道路。(毛澤東)

“第二個”、“第二次”都是序數。序數一律用“二”字。“兩個”、“兩次”的“兩”字都是基數單用。“兩年”是特例，因爲

“年”字是量詞，和數字連用一律不要量詞。例如：

鑽進去 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毛澤東）

“二”字“兩”字在多位數裏用法不一樣：十二，二十，二百，兩千，兩萬。“萬”前面有兩位，如“十二萬”，就不能再用“兩”。“千”在“萬”後，如“兩萬二千”，也不能用“兩”。

傳統的表示度量衡的量詞前頭，除“二兩”不能說成“兩兩”外，“二”字“兩”字都可以用，如“二尺、兩尺”。不過只能說“二丈二（尺）”，兩丈二（尺），不能說“二丈兩（尺）”，兩丈兩（尺），情形和“兩萬二千”不能說成“兩萬兩（千）”一樣。新興的表示度量衡的量詞只能用“兩”字，如“兩噸煤”。

北京口語的“兩(ㄌㄨˇ)、仨(ㄕㄚ)”是“兩個、三個”的合併，所以後頭不能再用量詞。“倆人”就是“兩個人”，不能說“兩個人”。又如：

丟不了，短一個我賠你倆！（老舍）

就是老頭子真犯牛脖子，我手裏也有倆體己，咱倆也能弄上兩三輛車，一天進個塊兒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滿街跑臭腿去強？（老舍）

“賠你倆”就是“賠你兩個”。“咱倆”就是“咱兩個”。“有倆體己”，“倆”是“兩個”，活用當“幾個”講。這三處的“倆”都能改成“兩個”，不能改成“兩”。“兩三輛車”也不能改成“倆仨輛車”。

“雙”字平常是量詞，比如說“兩雙鞋”。“成雙”的“雙”也是量詞的用法，比較“成正的布”，“成千的人”。“雙”字用作數詞，限於成語，如“雙重”、“雙方”。

### 3. 分數、小數、半、倍

分數的說法是“幾（分母）分之幾（分子）”，如“三分之二” $\left(\frac{2}{3}\right)$ 。分數前頭有整數說成“幾（整數）又幾分之幾”，如“一又三分之一” $\left(1\frac{1}{3}\right)$ 。百分數是指分母是一百的分數，平常拿來作統計比較用。

小數名“分 $\left(\frac{1}{10}\right)$ ，厘 $\left(\frac{1}{100}\right)$ ，毫 $\left(\frac{1}{1000}\right)$ ，絲 $\left(\frac{1}{10000}\right)$ ”只用在度量衡及科學工業上的小單位，普通數字用不着。整數後頭有小數，整數部分說法跟平常一樣，小數部分挨個兒說，中間加個“點”字。例如：“圓周率是三點一四一六（3.1416）”。小數前頭沒有整數，“點”字前頭加個“零”字。例如“一磅等於零點四五四（0.454）公斤”。

“分、成”都是十分之一或零點一的意思。例如：“三分手藝，七分傢伙”，“十分贊成”，“今年秋收比去年增加兩成”，“八成兒要下雨”。

“半”字是二分之一或零點五的意思。“半”字也和別的量詞一樣，可以用在量詞前頭，如“半個”。不過前有整數，“半”字就放在量詞後頭，如“一個半”。“一半天”是“一天或半天”的意思，“一半個”是“一個或半個”的意思。“三斤半”是三斤加半斤，“三個半斤”是一斤半。“半”字也是量詞，如“分成兩半”，“吃了一半”。

“倍”字的用法可以用幾個例子來說明：

九是三的三倍（ $9=3\times 3$ ）。

九比三大兩倍 $\left(\frac{9-3}{3}=2\right)$ 。

去年（一九三二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

擔穀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擔，去了七倍。（毛澤東）

本錢五角錢一擔，賣四塊錢一擔，賺三塊五，是本錢的倍。說明數量增加，常用“倍”字來表示。從三增加到六，人說“增加兩倍”，這種說法容易引起誤會，應該說“增加一倍”或“增加到兩倍”。

還有人用“倍”字來說明數量的減少，比方說麵粉價錢每袋十二萬元落到四萬元，就說是減少三倍。這種說法是誤的。我們說增減多少，說的都是差額，差額應該拿原來量作標準，不能拿減少後數量作標準。表示減少應該用分（當然也可以說一半，幾成），麵粉價錢從十二萬元落到四萬元，就說價錢減少三分之二 $\left(\frac{12-4}{12}=\frac{2}{3}\right)$ 。

### 4. 大概的數量

表示大概的數量，有三種方式。一是接近的兩個數詞列。例如：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毛澤東）

開調查會人不必要多，三五個七八個即夠。（毛澤東）“半年一年”是說一段大概的時間。“三五個”和“七八個”都大概的人數，現在連用，包括的範圍更廣。

“十”和“八”，“百”和“八十”之類也都可以並列：

不過既然看見了祥子，帶手兒的活，何必不先拾個頭八塊的呢。（老舍）

還不賞個百兒八十萬的！（袁靜、孔厥）

幹這一行，……嗓子得鏗鏘響，隔着千兒八百里，得喊的叫入聽見。（楊朔）

“千百”、“百十”也常常連用：

在千百萬農民羣衆中，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煽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毛澤東）

這廟總有百十來年了。（高玉寶）

“千百萬”是極言其多，“百十來年”是一百年左右。

二是在數量詞前頭用“成、上、小、至多、至少”一類字眼，後頭用“把、來、多、左右、以上”一類字眼。例如：

江孜是西藏織氈手工業的中心。這裏集居着成千的男女織工，每年織出上萬條的各種氈墊。（報）我手裏一共有五百來塊錢。……歸了包堆花了小百，還剩四百來塊。（老舍）

希望中央和兩省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毛澤東）

別人寫一遍，他總要寫十來遍；別人讀十遍，他總讀百把遍。（報）

再過個把月，等麥收以後不好嗎？現在急急忙忙的（馬烽）

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毛澤東）

每月也需用現洋萬元以上。（毛澤東）

“成千”是說可以拿千做單位計算。“上萬”是說夠一萬，一以上。“小一百”是不到一百。“至少三十人”是三十或者多。“十來遍”是十遍左右。“百把遍”是一百遍左右。“個月”是一個月左右。“八百多人”是八百掛點兒零。“萬元上”是比一萬元略多。



三是用“多少、幾、兩”。“多少”和“幾”也都是數詞，可數目：

使了多少錢？——三千五！（趙樹理）

你幾天沒有在旅館住？——就昨天一宿沒回去。

（曹禺）

以表示不定的數目：

有多少拿多少，沒準價兒！（老舍）

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毛澤東）

字表示的不定數總在十以下，“多少”沒有這個限制。

字還可以和別的數字連用，如“三幾，十幾，幾十，幾萬”。“兩”字也可以活用，當“幾”字講：

媽，我這兩天很快活。（曹禺）

兩天就是“這幾天”的意思。

## 5. 量詞

量詞可以分成四小類。（甲）個體量詞——名詞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個一個數的。這種名詞前頭用個體量詞，“個、隻、把、條、根、張、匹、件、塊”。口語裏“九個茶杯”不能說成“九茶杯”，個體量詞不能省。

桌上有幾個還不甚熟的白梨，皮兒還發青。一把酒壺，三個白磁酒盅。一個頭號大盤子，擺着半隻醬雞，和些燻肝醬肚之類的吃食。（老舍）

各位勞動英雄，各位模範工作者！……你們有三種長處，起了三個作用。（毛澤東）

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毛澤東）

名詞常常有特定的個體量詞，如“一張桌子，一把椅子，行李”。“個”字是最常用的量詞，有時候還可以替代特體量詞，如“一個桌子，一個椅子，一個行李”。指人平常用“個”字，如“一個客，一個人，一個小孩”。表示客氣用“位”，如“一位客，一位同志”，可是不說“一位人，一位”。

什麼名詞用什麼量詞，不一定有道理可說。例如：

四馬 一頭牛 一隻羊 一隻豬 一條狗

“匹”，牛用“頭”，羊、豬、狗用“隻”，豬還可以用“條”，狗還可以用“條”。平常抽的捲煙，可以說“枝”，也可說“棵”。就一般具體的東西說，形狀跟量詞有關。比方說，“一條繩子，一枝筆，一根棍子，一片肉，一張紙，一張牀，一把茶壺”。可是“一條命”，“一片好心”，只是如此。

“個”字還有些特別用法。（一）“個”字加在並列的數量前，表示大概的數量。例如：“買輛七成新的，還不得六塊嗎？”“混個三吊兩吊的”，“花個一百二百的”。

（舍）

（二）“個”字放在“有，沒（有）”和動詞形容詞中間。有個不累的嗎？是說“出門總是要累的”。“他那個主意不更改”，是說“他那個主意不會更改”。這類句法總有疑問和否定。成語就沒有這個限制，如“有個三長兩

（三）補語帶“個”字的，例如：

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被二諸葛攔回去，還罵個不休。（趙樹理）

這一層以前曾經討論過（本刊一九五三年二月號《補語》）。

（四）“一個”放在謂語前頭，表示條件或理由。例如：

他一個不答應，別人還能答應嗎？

汽車忽然一停，我一個站不穩，就摔着了。

這種加“一個”的句子，必有下文，單說“他一個不答應”，“我一個站不穩”，語意都沒有完。

（乙）集體量詞——名詞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組一組數的。這種名詞前頭用集體量詞，例如：“副、對、雙、套、幫、羣、班”。

這是誰家的孩子？居然把一幫小孩子管得住，還怪有精神的！（高玉寶）

（丙）度量詞——度量詞是約定俗成的計算單位，例如：“里、丈、尺、寸、頃、畝、石、斗、升、斤、兩”。

一千億元有多大的價值呢？可以買一億斤糧食，可以買十萬兩黃金，可以買十萬擔棉花。（報）

（丁）臨時量詞——名詞表示的事物，有的是有長度（包括空間的長度和時間的長度）、面積、容量的。這類名詞都可以作臨時量詞用。比方說“兩個碗”的“碗”是名詞，“兩碗水”的“碗”是量詞。有些臨時量詞前頭限用“一”字，是“滿”的意思。“一臉（的）汗”是說“滿臉汗”，“一樹的花兒”是說“滿樹的花兒”。

以上說的四種量詞，共同之處是放在指示詞、數詞後面，名詞前面，如“一個人，一羣人，一升米，一碗米”。這四種量詞用法也略有不同。現在提出三點來說：

（一）記帳或者列舉的時候，數量詞也放在名詞的後面。這種用法以度量詞為最多。例如：“白菜三斤，肉一斤”。

（二）臨時量詞與名詞之間常常用“的”字，如“一地的水，兩架子的書”。別的量詞不這麼用，我們不說“三張的紙，兩條的線”。

（三）十進的度量詞連用，最後的量詞可以不用，如“七尺五（寸）白布”。“十、百、千、萬”也有類似用法，如“三萬六（千），九百二（十）”。

“點”字“些”字也是量詞。例如：

[祥子]時時想到一個什麼意思，或一點什麼滋味，或一些什麼感情，都很渺茫，而又親切。（老舍）

我有了點進款：給學生織些東西，她們給我點工錢。

（老舍）

上句“一個……一點……一些……”並舉，最可以表示“點、些”是量詞。點、些都表示不定量。說到具體的事物，“些”總比“點”多。比較：“這裏有些蘋果，這裏有點蘋果”；“桌上有些水，桌上有點水”。說到不具體的事物，比如“滋味，感情”，“點、些”就沒有分別了。

“些個”是複合量詞。例如：

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個熟識的臉。（老舍）

她們所說的是家長里短，而她是野調無腔的慣了，不愛說，也不愛聽，這些個。（老舍）

“些個、幾個”有相同之處，前頭都可以加“好”字，也可以加指示詞，如“好些個月，好幾個月”，“這些個人，這幾個

人”，因此，“些個”的“些”似乎也可以看作數詞。不過，我們可以說“一些個”，而不能說“一幾個”。“幾個”可以用在句首，別的数量詞也可以，“些個”不能用在句首。所以，“些個”還是看作“量詞”合適。

還有些新興的複合量詞，如“秒公方、架次、千米小時、噸公里”之類。“秒公方”是水每秒鐘流量，以立公尺計算。“蘭州黃河年平均流量是一千一百秒公方”，這是說每秒的流量一千一百立方公尺。每架飛機出動一次叫作一架次。“飛機出動五十架次”，可能是一架飛機出動五十次，也可能是五十架飛機出動一次，還有別的可能。同樣的，每小時走一千米（一公里）叫一千米小時，每噸貨物運輸一公里叫一噸公里。這些量詞後頭不能再加名詞，前頭有時候可以加“個”字，如“火車的速度是五十個千米小時”。換言之，這些複合量詞很像名詞。

在動詞後頭，量詞前的“一”字可用可不用，上文已有好些例子。又如：

屋裏有白白的牆，還有條長桌，一把椅子。（老舍）  
“有條長桌”就是“有一條長桌”。“一把椅子”前頭有停頓，不能說成“把椅子”。不用“一”字也不限於動詞後頭。例如：

你母女兩個好生生把我個孩子勾引壞，你倒有臉來找我，咱兩人就也到區上說說理！（趙樹理）

光個主席也做不成事，一定要全體會員都動起來。

有些名詞可以直接和數詞連用，當中不加量詞。這種名詞可以叫做“準量詞”。例如“四國，三省，兩年，一季，半天”。現在我們把“年、月、天”三個字的用法比較一下：

她跟小芹雖是母女，近幾年來却不對勁。（趙樹理）

山裏人本來就膽子小，經過幾個月大混亂，死了許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趙樹理）

二諸葛連連搖頭說：“唉！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趙樹理）

“年、天”前頭都沒有“個”字，是準量詞。“月”前頭有“個”字，是普通名詞。不過“一個月、兩個月”也可以說“一月、兩月”。

不但名詞有量詞，動詞形容詞也有量詞。

動詞的量詞表示行為的數量，有三種。一是專門表示次數的，如“次、下、回、番、遭、遍、趟”等。

路剛修好，又下起雨來。連修三次下三次（蕭高嵩）

[興旺]並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發動婦救會也鬥爭小芹一番。（趙樹理）

二是拿行為憑藉的工具作量詞。例如：

雖說沒打這老傢伙一拳，沒踹他一脚，可是老頭子失去唯一的親人，而祥子反倒逍遙自在；誰說這不是報應呢！（老舍）

祥子不由的看了她兩眼（老舍）

這兩種量詞，以前講《主語、賓語》的時候已經討論過（本刊一九五三年一月號）。三是重複動詞。例如：

小朱……累的直喘，想歇歇一歇。（楊朔）

姚志蘭一撒手，小朱滾兩滾爬起來。（楊朔）

祥子想說“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沒想齊全。（老舍）

蛤蟆蹦三蹦，還得歇三歇呢，我總得追停兩天。

（袁靜、孔厥）

重複動詞，當中用不用“一”字，意思差不多。例如：

你到廚房去看一看，看看……做的什麼素菜。  
“看一看”後頭有停頓，“看看”後頭沒有停頓。有時候一樣：

到處賣票，讓大家都看看這個戰犯的嘴臉。看一個錢，票錢都捐給朝鮮愛育院，誰叫他製造孤兒呢！（楊朔）

這個例子裏的“看一看”是看一次的意思，不能說成“看

形容詞也可以與數量詞連用。例如：

全島東西一里長，南北百米寬。（報）

這隻鴨子三斤重。

那盞銅燈有四寸高。（楊朔）

二十八年那一年下暴雨，把山上一搜粗大樹都連根扔到山根脚下。（劉白羽）

這些句都是數量詞放在形容詞前頭的。數量詞放在形容詞前頭，有兩種意思。有一種意思和數量詞放在形容詞前一樣。“全島東西一里長，南北百米寬”，也可以說成“全島西長一里，南北寬百米”。又如：

一個大蘿蔔重二十五斤。（李有義）

還有一種是表示差額的，通常用在表示比較的句子裏，詞只能放在形容詞後頭。例如：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魯迅）

[吐魯番盆地艾丁湖]湖面比海平面還低二百八十八公尺。（報）

咱不行，咱比人家矮（矮）着一截呢。（袁靜、孔

“點、些”放在形容詞後頭，是表示程度的，比如“

兒，大一些”，都含有比較的意思。例如：

金桂！準備準備走吧！早點去早點回來！（趙樹

您好一點了麼？（曹禹）

我比她們明白一些，實際一些，（老舍）

“有點熱，有些冷”一類用法，以前曾經討論過（本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號討論“有”字那一節），讀者可以參看。

## 勘誤表

月號	面	欄	行	誤	正
6	14	右	10	我們只有	它們只有
7	4	右	倒1	六略書	六書略
7	9	右	20	不要造違背	不要違背
7	10	右	20	張壽庚	張壽康
7	10	左	24	批判過的各書	批判過的古
7	12	左	倒12	陸志偉	陸志章
7	16	右	倒5	kék	kék
7	17	右	8	niu	niu
7	17	右	9	B	Bi
7	20	左	倒11	這個班	這個班子
7	22	左	13	看這	看這
7	29	右	20	X7	X7
7	30	右	倒1	T r	Tor
7	32	左	3	高級年的	高年級的
7	35	右	倒3	高不低同	高低不同



上語文課的時候，老師往往在每段講解過後，用簡練的話概括地寫出這一段的大意來。碰到作品，特別是小說或戲劇，還要運用文學的術語，同學們這篇小說或戲劇應劃分幾個“場面”。究竟叫“段落”？什麼叫“場面”？段落與場面有什麼關係？我想把這些概念和關係搞清楚，也是必要的。

我們寫文章要分段的用意，不外使文章有條理，分明，讓人看起來容易明白自己的意思。文章就是思想有條理的具體的表現。思路清楚，文就通順；文章亂七八糟，必是因爲對客觀事物認識不夠，思想模糊的緣故。俗語說“打腹稿”，就是在寫之前，根據對客觀事物的正確的理解想好文章的大意。我們看見會寫文章的人，“下筆千言”，“一呵成”。這並不神祕，大半是因爲他事先打好了腹稿，一到作文時，便好像文書抄寫公文一樣，毫無思索了。不會作文章的人，“搜索枯腸”，白紙上寫黑字，固然是由於生活經驗貧乏，讀書少；也有由於事先沒有打“腹稿”——把亂麻般的思想整理來的緣故。因此要文章寫得好，寫得快，除生活經驗外，首先還要養成打“腹稿”的習慣，使現實反映到我們頭腦中的印象按着寫作的目的整理出條理來：那些先說，那些後說，那些放到後面說。這樣寫出來的文章，便段落分明了。

有適當的分段，才能使文章眉目清楚，儘管沒有寫出“段落大意”寫出來，而讀者却好像看見了“段落大意”。有適當的分段，才能使讀者到地方喘一口氣，消化這一段的內容，然後進一步往下看。如果沒有適當的分段，文章勢必像一堆亂麻，找不到頭緒；好一點的文章，也會像“神龍”一般，使讀者見首不見尾，抓不住文章的綫索，興味索然，也就不再看下去了。①

一篇文字的分段不是偶然的，一段是思想的或一個自然的段落。少說點就不夠，多說點就累贅。一句可作一段，五十句也可作一段，句子可多可少，看應否告一段落。寫到某處，我們會覺得已經說了一個道理或一件事實，而且下面要改說別的了，在此停住，作爲一段。”②

如魯迅先生的《故鄉》（見《初中語文課本》第六冊）開頭說：“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

十餘年的故鄉去。”這一句，就是“一句可作一段”的例子，因爲它是思想的或事實的一個自然的段落，接着就改說什麼季節、什麼天氣、懷着什麼心情和目的回故鄉的一段話。有的老師因爲它只是一句話，併入下段一起講解，如果是真正“心知其意”，這一句的確是一段，只是爲了省事，倒也可以；但必須對學生指出這一句話就是一段，它是獨立的，是總冠全篇的，不是下一段或其他任何一段的“附庸”。

又如趙桂蘭同志寫的《用黨給我的右手爲黨工作》一文（見《高中語文課本》第二冊）開頭說：“我今天能在旅大黨代表會議上講話，我首先要感謝黨，因爲黨的關心，我的傷口才好得這麼快。第二，我還要感謝黨，感謝黨對我的培養；要沒有黨的培養，我就不能有今天的光榮。”這兩句話是全篇的一個總冒，也是一段，因爲下面作者改說別的“在兩年前……”如何如何了。

假如我們的思想有條理，我們必然會這樣適可而止的，自自然然地分段。如果思路混亂，段落便分不清楚；而拉扯不清、拖泥帶水的文章，必是糊塗文章。

文章的每一段落，是文章形式的一部分。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我們分析文章的段落，也必須根據內容判斷，不能從形式出發。如果看見一兩句話單獨寫一行，就以爲是一段，那是很容易出錯的。如魯迅先生的《故鄉》說他“漸近故鄉時，……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他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於是說：“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從形式上看，這是獨立的，上下都無所依傍。像這種情形，在抒情散文中特別多，只是作者爲了加強語氣，突出這一句，刺激讀者的視官，引起特別注意而已。凡是這樣的情形，不能算作一段。因爲它不是思想的或事實的一個自然的段落，下面說的也還是故鄉，並沒有改說別的，不同的，只是由眼前的故鄉聯想到從前的故鄉罷了。因此，一段可能是一句，但一句未必是一段。必須根據內容加以判斷，千萬不可從形式出發，

① 這一段話引自1951年3月《北京文藝》二卷一期老舍：《散文並不散》一文中的一个小節。

② 借用老舍：《散文並不散》中的原文。

以免上當。如果文章中有某一段包含着一定的人物在一定的時間和場所內活動，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產生了情節，即產生了有意義的動作和人與人的關係，那麼這一段就可以說是一個“場面”。如果不是這種情形，那這一段還只是一段，不能算是“場面”。

場面不像段落，除了是思想的或事實的一個自然的段落外，還必須具備人物、時間、地點和一定的條件。比如說你在星期日那天看見一個人坐在公園裏，這只能算作一個風景性的“鏡頭”，不能算是文學作品中的場面。因為你把這個“鏡頭”寫成文字，毫無意義，並不起什麼作用。但是如果你看見的這個人在向遊人散發傳單，作一些政治性的宣傳工作，那麼這個人便擺在一定的條件下活動，他的行動產生了社會意義，將他描寫出來，就可算是一個“場面”。但這個“場面”，只是速寫的“場面”，與小說或戲劇中的“場面”還得有些區別。速寫的“場面”大概以“真人真事”為基礎；而小說或戲劇的“場面”却多半是在同一階層中許多“真人真事”的“場面”的本質的概括而集中的表現，帶有所謂“典型性”。這是一層。速寫的“場面”由於篇幅的限制，多半是獨立的；而小說或戲劇的“場面”却沿着一定的主題思想，有它的變換性和發展性。比方魯迅先生的小說《藥》有六個場面：一是準備買藥，二是實際買藥，三是燒藥，四是吃藥，五是藥的來源，六是吃藥而死之後。前四個場面人物都以華老栓為主要的線索，其他時間、空間與條件沒有大的變動，一個接一個只算是場面的變換。第五個場面人物雖似以老栓為主，但新的人物康大叔出現，講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英雄事蹟，把讀者的注意力由吃藥方面引到藥的來源方面。這個場面便不是變換，而是從前面的場面發展出來的新的場面。至於第六個場面，人物、時間、地點、條件幾乎全變了，以吃藥而死的小栓的母親華大媽上墳為線索，引出藥的供給者——被殺的革

命者夏瑜的母親來上墳和發現墳上的花園，使《藥》主題提高到思想性的最高度。這也是從第五個場面展出來的。<sup>⑤</sup>這種“場面”的變換性與發展性，也寫或一般的記敘文所少有的。這是第二層。速寫或一般記敘文有些段或節，有時只是孤立地敘述事實或景物，與穿插在作品中的“場面”，並沒有多少的關連；而小說則不然，很少孤立地單純寫景，或抒情的段落，不是每一段一個場面，就是好幾段現一個場面。（雖然那些段節有主要和次要之分，終於是為表現那個場面而服務的。）這是第三層。有，速寫的場面或一般記敘文中所穿插的場面不說中的“場面”的錯綜複雜和帶有比較強烈的戲劇性，這是第四層。因此一段速寫和記敘文，儘管也有“場面”，但與小說的“場面”是有區別的。老師講章，除小說外，一般的文章也就可以只分段落，硬分場面。

小說的每一“場面”，可能是一段和數段，但的每一段落都不一定是一個場面。段落的作用，我們明白文章的結構；“場面”的作用，不但使我們明白作品的結構，而且使我們明白貫串在文學作品故事的情節，欣賞穿插在作品中的畫面，從而掌握物性格，判斷這篇作品暴露什麼，歌頌什麼；或什麼，贊成什麼。

大概說來，分析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和戲劇儘可能在分析段落的基礎上畫分場面。如果是性的記敘文，就只要分析段落，不必強分場面。論說文，更無所謂“場面”。縱然作者偶爾借用一象性的故事或傳說來說明抽象的道理，那也只是作為舉例用的手段，不能因此說教論說文也要分面”。因為這種作為手段用的場面是孤立的，沒有的，即它的本身並沒有具備變換性和發展性的特

⑤ 此節舉例參考艾蕪《文學手冊》，177—190頁。

## 我也談詞句解釋

·小舟·

讀到《中國語文》第9期陸開江同志《談詞句解釋》一文，給我以很大的啟發。以前我總認為解詞在語文教學過程中不過是順手捎帶的事情；分析教材，發揮教材的思想內容才是主要的。因此，我在講解生詞的時候，只是把詞典上的解釋照樣抄給學生，詞典上沒有解釋的，就憑個人的想像硬加上註解。這樣，不但使學生對詞的意義混淆不清，而且給學生灌輸一種錯誤的認識。現在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講我們志願軍戰士的品質是“高尚”的，把“高尚”註解成是“崇高而不俗凡”，這樣就沒有說明志願軍是具有國際

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和平戰士，使學生把我們的革命理解成傳奇式的人物。又如在講解志願軍戰士的狙擊手把“狙擊手”註解成：“狙是獼猴，像猴子一樣伺人不備之”。這樣不但把我們戰士智勇雙全地襲擊敵人的英雄行釋不明白，而且庸俗化地侮辱了我們的戰士。

（二）講全世界人民怒吼了，反對細菌戰。把“怒吼”從詞典上抄下來講給學生說：“怒吼就是野獸怒叫”。因生用這個詞時，寫成美帝國主義向人民“怒吼”。更嚴重誤，是在講井崗山起義時，我把蔣匪幫三番五次地向我行圍剿的“圍剿”註解為“消滅敵人”。以上解詞都犯了的錯誤，這種沒有立場的講解，給青年學生是多麼大的現在想起來甚為痛心。

由以上兩例證明講解詞句必需結合課文，有明確的立場慎重地講解。只有這樣，才能在教學中貫徹政治思想教



## 本社舉行學術譯名問題座談會

七月十三日下午，中國語文雜誌社在中央高等教育部辦公大樓會議室舉行了“學術譯名問題座談會”。出席座談會者有劉澤先、鄭作新（黃瑾代）、黃宗甄、陶坤、袁翰青、陳文彬等先生（以簽到先後為序）和本社副總編輯林漢達、編輯委員曹伯韓、鄭之東以及本社其他工作人員共二十人。

會議主席林漢達副總編輯首先說明了座談會的性質和用途。他說：“今天召開這個小的座談會，來討論關於學術譯名的大問題。外國語專名翻譯，過去不單是這個人跟那個人不同的，就是同一個人、同一本書上也不見得統一。這個問題多少年來沒有解決。音譯如 sofa 變成了沙發（PYCY），Canada 變成了加拿大（HLYZYBY）。科學名詞之簡縮為漢字者，如水銀改成錄，流黃叫做硫……，這樣是否合適，這些問題都關涉到翻譯上的一些原則，關涉到標準音，……今天特請大家討論，交換意見。”

座談會着重討論了外國語專有名詞（人名、地名等）如音譯的問題。到會者多數認為音譯是比較便利的一種翻譯法，在人名、地名的翻譯上更應該普遍運用音譯。至於怎樣的音譯漢字，過去不統一的譯名，可以定出標準，根據標準改正，以後就按這標準來定名。他們認為在方塊漢字改以前，用漢字譯音比較切合實際應用；其他音譯法只能當輔助辦法。對這種主張提出不同意見的人認為：目前譯名不一的現象，主要是由於用漢字譯音造成的，如果仍舊用漢字譯音，不可能收統一的效果。並且，有些音沒有字、有些字太難或字面不好看，……這些用漢字譯音的老毛病，也仍然無法克服。因此他們主張用注音字母來代替漢字譯音。他們

認為只要製出漢語和外國語的對音方案，按照方案去翻譯，就可以免去不統一的毛病。由於注音字母在我國已經應用了三十多年，特別是速成識字法在各地推行以後，注音字母有了更廣泛的羣衆基礎，現在用它來譯音，當不會有什麼大困難。持第一種見解的人，對於用注音字母譯音能收統一效果一點，表示懷疑。他們說，北方人南方人讀音是不同的，因此用注音字母可能也有問題。並且注音字母是否就是將來的拼音文字字母？如果不是，將來實行拼音文字的時候，這些譯名還得改一次，這不麻煩嗎？

如可音譯儘管看法不同，但是譯名必須設法統一，這一點，大家的意見却是共同的。會議對統一學術譯名的原則也交換了意見。發言的人多數認為音譯意譯各有好處，可以兼用。有人指出現行化學名詞裏，有些本來是複音的基本詞都被簡縮成爲單個漢字了，例如鐳錠（radium）簡成了“鐳”、阿莫尼亞（ammonia）簡成了“氨”……；化學名詞裏新造的方塊字不少，例如羥、羧、羧……這不但不合乎漢字以單字造複音詞的原則，而且造字也沒有注意到易於認識的原則，使得漢字系統更加混亂、繁雜；同時在實際應用上也是很不方便的。這種情況最好儘量避免。有人認為學術名詞的制訂，首先應該考慮的，是能否適應科學發展的需要，能否爲大衆所接受。現行化學名詞在這兩點上並沒有大問題。有些個別的缺點，可以在原有的系統下，從實踐中加以改進。對於這個問題，會議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

主席林漢達在最後的發言裏，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他指出學術譯名的統一是比較複雜的問題，希望今後能夠在《中國語文》上繼續討論，求得一致的看法，逐步解決。他說：學術譯名問題跟文字改革工作是有密切關聯的，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考慮，對問題的解決也許是有幫助的。

## 借尸還魂的“倍”字

· 寒 ·

《新華月報》七月號圖片欄裏有一組圖片，介紹我國第一個塑料工廠，說明文字中有這麼一句：“五倍子是西南大宗的土特產之一，從中提煉的倍酸是製造塑料的主要原料”。我看了那個“倍”字和“倍酸”這個詞兒，感到很生疏，可又知道中藥店裏有一種五倍子，是可以提煉出一種五倍子酸，作爲工業原料來用的。於是猜想“倍”字是從“倍”字分化出來的新字，字典裏大概是沒有的。我翻查《辭海》，却發現有“倍”字，不過和五倍子毫無關係。它的第一種讀音是 ㄅㄟˋ，就是“棒”的異體字。第二種讀音是 ㄅㄟˊ，意義是“蹠板”，

也就是“跳板”，《公羊傳》成公二年，有一句話用了這個字。我才知道，這個“倍”字古已有之，到現在要算是死字了。人們却用它來代替五倍子的“倍”字。這可以說是“借尸還魂”。

借尸還魂的原因，大概是爲了想把五倍子酸簡化爲“倍酸”，於是就進一步拿“倍”這個單音節來代替“五倍子”這個三個音節的詞兒了。好好的一個“五倍子酸”不叫，故意要縮成“倍酸”，還要添造古怪的“倍”字，增加人們學習文字的困難。這就是文言文的餘毒！



## 對於字母問題的意見

編者按：本刊第十一期信箱欄發表了伯韓和谷敏兩先生的文章以後，收到一些讀者來信。現在繼續發表如下。

### (一)

編者同志：

讀了《中國語文》十一期上伯韓同志和谷敏同志的關於字母問題的文章以後，有下列幾點意見。

一、我認為伯韓同志討論問題的態度是穩重的實事求是的。民族感情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當我們在大學中文系裏發起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討論時，很多老師同學淡然處之，有的老師甚至公開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雖然不一定正確，不一定充分，但是他們反對的情緒是強烈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民族感情問題（當然有些人反對的論點是錯誤的，但是民族感情問題，至少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二、民族感情不只是在知識分子中存在，羣衆中也是強烈存在的（這一點我們且不從理論上去說它）。當我參加土地改革的時候羣衆對於英文字母（他們稱之爲“洋文”）是討厭的、輕視的。若叫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弟用“洋文”寫字，恐怕事實上行不通。

三、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確的。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才能取得勝利。《中國語文》創刊號中，郭沫若先生的講話裏曾提到毛主席的指示：“準備走拼音的道路，字母必須採取民族形式”（郭先生語）。當我們（那時我還在大學讀書）看到這個指示後，大家奔走相告，莫不歡欣鼓舞，平時反對拉丁化新文字的同學和老師，也表示擁護這樣的改革。這種情形我想在他處一定也會有的。文字改革工作者得不到廣大羣衆支持，光靠下幾個命令是不行的。我們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細緻地去研究，吸取廣大羣衆的意見，我們才能勝利。若離開了毛主席的指示，片面地、主觀地、粗暴地對待問題，不把廣大羣衆放在眼裏，那是一定改革不成的。

四、關在研究室中研究問題是不行的。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了，但是成績是太小了。其原因很多，我想，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是重要原因之一。現在，這種情況已根本改變了，但是還很不夠。關心文字改革的人還是少數，研究它的人更是少數。而這個問題只靠少數人搞，是不行的。（費慶）

### (二)

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負責同志：

當我們看了《中國語文》十一期伯韓同志《關於字母問題的幾點解釋》以後，有這樣個意見：新文字的字母要以科學的標準來決定採用那種形式，用不着也不必遷就所謂民族感情、民族形式。

伯韓同志講：假使叫幾百萬用慣漢字的革命知識分子，不但仿照外國字來拼音，而且要改用外國字母來寫，在民族

感情上可能過不去。因此也就很難使他們自覺自願地掌握種字。爲此，我們曾徵求了五六個革命老幹部和四五個知識分子共十多人的意見。問他們如果把漢字改爲拼音文字時用與漢字有關係（寫法上有的像漢字）新創造出來的字母呢，還是用拉丁字母 abc…… 好呢？其中八個人（三個幹部五個知識分子）講：用拉丁字母好，因爲它好寫好看。假使還仿照漢字邊角，怎樣改也不會比拉丁字母再好了。他二三個人沒有主見，他們講：最好不改，如果要改，用什麼樣的字母也可以。顯然他們對用外國字母來拼來寫，並像伯韓同志所講，在民族感情上有什麼過不去。

另外，關於一般羣衆對文字的面貌可能發生些感情的問題，這倒是事實。我們曾問了一個剛參加速成識字班的老對字形的看法，他講：“中國字多麼好，外國字勾勾牙牙像什麼！”不過，我們以爲這種感情是極其狹隘的，他不從科學上着眼，而是僅從他那“習以爲常”的習慣上着眼。之，我們不應無原則地遷就所謂人們的習慣，不應無原則強調民族風格。我們認爲如果能創造出一種比拉丁字母還——好寫、美觀、不失民族風格——的話，當然可採用這字母；如果只是爲民族自尊、民族感情、民族風格而硬造一種區別於外國文字而並不一定比人家科學的字母形式話，那勢必要走彎路，甚至給後代留下麻煩。

因此，我們第一同意谷敏同志的意見，即“在報刊上開字母問題的討論”。第二望能實地調查一下到底羣衆喜哪一種形式和對這問題的反映。（丁永福、相望等）

### (三)

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負責同志：

我是衷心擁護文字改革的一員，我日夜希望文字改革實現。但是我有一個問題不能理解，就是爲什麼不用已經了一些基礎的拉丁化新文字，而一定要採用民族形式的字母。

雖然伯韓同志在《中國語文》第 11 期已作了一些解答，但是我還是搞不通。

誰都知道咱們大夥兒關心的只是文字改革的問題，不是語言改革的問題。改革了語言那就是去掉民族形式。現在改的是文字，使新的書寫記號體系能更好爲咱們的語言服務。這只會更鞏固民族形式，不會絲毫有損於民族形式。作爲字，漢字是最民族形式的了。假如用漢字寫下這樣的句子“爲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粉碎美帝國主義所進行的罪惡的菌戰爭，並改善環境衛生和養成個人衛生習慣，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證國家建設計劃的順利進行，上海市各級組織……”（見《語文知識》11 期）。這能算是民族形式嗎？

伯韓同志對於不採用拉丁字母的理由之一是：“用 26 拉丁字母拼寫漢語，也是有困難的。例如，zh ch sh ng 不能採用單一字母。”

這就接觸到怎樣使用拉丁字母的問題了。要像英美那地用拉丁字母，那自然會如伯韓同志所說 zh ch sh ng 不能採用單一字母；如果像俄文那樣 Б音[v] ы音[o]



本刊五月號《關於字母問題的幾點解釋》一文中引述張茂梁先生來信要點，有不正確之處。全句應更正如下：“張茂梁先生來信中問我們對於聲調問題和字母音值問題解決了沒有，從他寄來的《中國拼音文字方案》參證，我們知道他所指的聲調問題是包括各地方言的調類的問題，而字母音值也是要照顧各地方言，同時認為注音字母 L 和 π 的音值相同，n 和 en 兩音也可以用同一字母表示，等等。這些其實都是語音問題，與字母形式無直接關係。”

26 個字母，咱們也可以做到一音一符。zh 國語羅馬作 j，rh 作 r，假如依利瑪竇用 X 做 sh（r 用 h），那樣的 ch 儘可以用 q 代，而 ng 呢？那就用 w 好了（要像拉丁化新文字那樣使用界音法）。那麼我們就有：

zh ch sh rh ng  
j q x r w

我們寫“保衛世界和平萬歲”，就是 baoui xgie hepiw wai。這真正是中國自己的拉丁化，也可以算民族形式吧！能夠這樣，過去留下來的英文打字機咱們完全可以利用。

伯韓同志說浙江諸暨有個人努力三十多年還未能超過中、六十年來前輩所得到的成果，這就使我記起來五、六十年來朱文熊所說的“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通行之字母。”時間過了半世紀了，咱們何必再走五、六十年來章《中華新字》的老路。

咱們本來也有工尺譜，為什麼現在一般都改用簡譜 1 2 3 4 5……？咱們本來也有數碼字 一 二 三 四 五……，現在為什麼也用 1 2 3 4 5……？現在大家用慣了，倒也沒有什麼“非簡”之感了，人民政府有意推行拉丁字母的話，三五年大家也就安之若素了。

這裏我提一個實際問題，現在工農都在加緊學習，好多進工農速成中學，也念物理、化學、幾何、代數，他們不懂 y，不懂得 A B C，不懂得 H<sub>2</sub>O，我親眼看到某工農速成中學把 26 字母紅筆大書掛在黑板上，抽出一個相當的時間教。爲着學科學，咱們似乎不能和 26 字母絕緣，除非一下子把 A B C 改爲民族形式甲乙丙，既然非學不可，何不因利乘便而以此爲新拼音字母？

不要執着字母形式問題。否則，會拖延文字改革實現的。（金刀）

#### （四）

同志：

看到了伯韓同志《關於字母問題的幾點解釋》後，使我明瞭些問題，但是也還有些不同的意見。

“解釋”說：“羣衆接受‘拉丁化拼音文字’這種文字，並不難，問題在於成百萬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用慣了漢字，不歡迎改革。”伯韓同志的估計可能是有根據的。不過我起了自己所接觸過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個革命的知

識分子，他們很少反對採用拉丁字母，事實上也真有些不遺餘力地積極贊助的。當然這祇是個人的管見，不足以說明一般；可是我也在懷疑，懷疑伯韓同志的估計的正確性，因爲我所碰到的知識分子不一定全屬例外。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廣大知識分子的意見。

根據伯韓同志的“解釋”，我曉得了由於我把漢字改革同土耳其文字改革看成一樣了，因而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不過土耳其文字改革是不是就像伯韓同志說的那樣簡單，好像祇改了改字母，還值得考慮；因爲寫法上的系統化與簡化亦不應忽視。據說爲此基馬爾曾親自動手搞過。另外，若祇改了改字母，那麼原來的文字已經保留了“民族形式”，已經達到了漢字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何苦還要改呢？“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列寧既表贊同，足見是需要改的。可是這不等於說我們將來也要走這條路嗎？我們是不是要走這條路，伯韓同志沒有提，我看這點值得明確一下。

養成拼音習慣，的確是件難事，也是件極其重要的工作，我想這點誰也不會否認。並且正由於問題的關鍵在此不在彼，我才提出不要放棄拉丁字母另搞一套；正像數學上的阿拉伯數字，音樂上的五線譜、簡譜一樣，由於其不抹煞數學、音樂的民族特點，我們都利用了國際通用而又便利的數字，記譜法，沒有“執著”。我們爲什麼非重整旗鼓另搞一套“還不夠簡單便利”的民族形式的字母不可呢？說是因爲中國是個大國，可是蘇聯也簡化過字母呀。說是又加上一層困難，可是土耳其人能克服的困難，我們就克服不了嗎？再說，拉丁字母，凡屬中學生不都得學嗎？而中學生將來豈不是到處都是嗎？困難，的確不大好找！

漢字既然肯定不是拼音文字，從這種民族形式裏怎樣發生不同體系的拼音文字字母，這倒是件令人難解的事。豈不是要主觀地創造嗎？要是那樣，我看“注音符號”這套經驗已經夠瞧的了，唐蘭先生也遇到過困難，難道我們的創造家們比起這些人來還有更妙的辦法嗎？伯韓同志很強調“一定的條件”，不過就我所知道的，郝建華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以前是不大瞭解新文字的，假如他瞭解並用了新文字來當拐棍兒，那又怎麼說呢？黎錦熙先生曾一再申明“注音符號”的根據，當然也強調了民族形式，可是我想問一問一般的高中學生，是不是他們已經“領悟”了這裏邊的奧義？是不是他們由於看到這是民族形式而感到親切、易用？我們還是根據事實來看一看吧！（谷敏）

#### 北京郵局聯合啓事 人民教育出版社

遵照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和出版總署規定的報紙雜誌預訂制度，本月份（八月）開始徵求第四季度的雜誌訂戶，請讀者及時到當地郵局辦理訂閱本刊的手續。

# 新華字典

## 出版預告

· 新華辭書社編輯 ·

全書共收字頭（包括單字和複詞）六千餘條，正文注解和首尾序例附錄計約五十萬字，插圖三百七十餘幅，篇幅在七百面上下。開本長 15.4 公分，闊 10.5 公分，紙面布脊精裝。版式、開本、紙張、裝訂等，經過詳細計劃，特別顧到「耐久」、「方便」、「美觀」、「經濟」。全書在排製中，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出版。

本字典為適應需要，收字取義的標準以下列讀者做中心對象：1. 小學教師；2. 初中學生，3. 初中文化程度的幹部。

· 本字典的總目標是為幫助讀者掌握祖國語文的規律。

本字典編輯的精神在「現代化」和「規範化」。為了現代化，力避舊日字典注解籠統含糊的習氣。為了規範化，特別注意實際應用的例證。在這樣的精神之下，新華字典初步表現了「推陳出新」的意義，編輯的體例提供了一些新辦法，改變了向來字典的面貌。

本字典所收的字頭按注音字母的音序排列，使讀者便於查檢。如果只會說某些詞語可是不知道那些字怎樣寫，只要按照那些詞語的聲音來查檢，便能很快地就找到那些字。另附「筆形檢字表」使只知道字形而不知道字義的讀者也能滿足需要。

為了一般應用的需要，本字典另加附錄十種：1. 注音字母表；2. 標點符號用法；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4.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5. 中國歷代紀年表；6. 各國人口、面積、首都一覽；7. 各國本位幣名一覽；8. 重要紀念日表；9. 中外度量衡表；10. 化學元素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合辦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月刊

一九五三年八月號

第十四期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乙十二號

社長 韋 慈

編輯委員 吳曉鈴 林漢達 韋 慈  
曹伯韓 葉恭綽 葉聖陶  
黎錦熙 鄭之東 羅常培

總編輯 羅常培

副總編輯 林漢達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佟麟閣路十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 訂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代 銷 處 全國各地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00001—63,600

預定辦法 { 三個月三期 4,800元  
半年六期 9,600元  
全年十二期 19,200元

寄費 { 1. 平郵寄費不計  
2. 掛號郵費由定戶負擔